



第 30 期（总 30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目 录

■ 新闻动态

北大七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4
北大通识教育大讲堂开讲 林建华校长畅谈北大教育发展之路	6
北京大学举行第三届人才论坛，助力学术科研人才培养与输送	8
陈汝东：田园诗是中华话语文明的发展方向	10
北京大学 2016 新年中外新诗公益朗诵会举行	11
“我问白说”北大学子对话白岩松	12
北大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 80 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师生歌会	14
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张婉愉荣获 2015 年度罗德奖学金	16
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活动举办	17
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18

■ 网教之声

敢为天下先的大上海 终身教育是怎样突破的？	20
李英强：让教育回归“立人”的本质	25

■ 北大人物

杨立华：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33
张树华：一树芳华育桃李	38

■ 学者谈读书

谭继和：谈读书 ----- 45

老舍：谈读书 ----- 48

■ 好文共赏

屠呦呦瑞典演讲：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 51

■ 史苑钩沉

汤一介：北大有三宝 ----- 57

■ 大美北大

燕园 雪中 ----- 61

■ 学员心声

博雅塔下聆教归 ----- 63

编辑寄语

12月7日下午1点,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医学礼堂举行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演讲,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发表演讲。屠呦呦在演讲中讲了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赞扬了中国科学家的团队精神。好文共赏当中选录了屠呦呦的大会发言稿。

进入12月的另外一个好消息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2015年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北大七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峰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鹃、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新闻动态

北大七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日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2015 年院士增选结果揭晓,北大六位教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选人数连续三次居全国高校首位。新当选的七位院士信息如下:

张平文,男,1966 年 7 月生,湖南省长沙县人。1992 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计算数学和科学计算研究。

谢心澄,男,1959 年 2 月生,江苏南京人。1988 年 5 月在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院长、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首批“千人计划”。长期从事凝聚态物理理论研究,在量子霍尔效应、电荷及自旋输运、低维量子体系等领域

中,对新型量子现象的预言及理论解释做出了系统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贡献。

席振峰,男,1963 年 4 月生,河南虞城人,1996 年 9 月在日本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分子科学研究所功能分子科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为金属有机化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如,女,1969 年 11 月生,福建南安人,1997 年 7 月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微电子与固体电子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长期从事集成电路新器件与新工艺研究,在低功耗器件的新机理新结构、纳米尺

度器件和关键共性工艺等方面作出系统、创造性贡献，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

俞大鹏，男，1959年3月生，宁夏中卫人，1993年10月在法国南巴黎大学固体物理实验室材料物理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从事半导体纳米线材料的制备与物理性质关键科学问题的研究，开启了国际纳米线材料研究新纪元，在其可控制备、新颖物理性质研究以及应用基础研究领域作出了原创性和系统、深入的学术贡献。

倪晋仁，男，1962年8月生，山西山阴人，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水利学院，1982~1989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将水沙科学与环境工程技术结合，在河流动力地貌、河流污染控制技术及河流治理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

张远航，男，1957年7月生，重庆城口人，1990年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大气污染的基础理论和防治技术研

究，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形成了集污染探测、理论研究、决策支持和区域实践为一体的学术思路，取得了大气氧化性增强机制及灰霾成因的理论创新，实现了区域立体监测和大型综合观测的技术突破，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区域大气复合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并选择珠江三角洲开展长期定点实践，为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提供了科技支撑，也为国家和其它区域提供了技术借鉴。



北京大学 2015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合影



北京大学 2015年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目前在北大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74 人，中国工

程院院士 13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1 人。院士总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一。

摄影：李香花

编辑：拉丁

北大通识教育大讲堂开讲 林建华校长畅谈北大教育发展之路

2015 年 12 月 3 日下午，北京大学教务部主办的“通识教育大讲堂”系列讲座启动。在第二体育馆 B101 报告厅，校长林建华作了题为“北大教育发展之路”的首场演讲。讲座由教务部部长董志勇主持。

林建华首先回顾了中国高等教育和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北大教育教学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形势下的国家发展战略对人才有了新的要求，这对本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高等教育再也不能停留在过去，而对于北大这样一所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综合性大学，更要肩负起本科教育改革的责任，在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中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为此，北京大学要通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引领未来的人”，他们

应当更具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能够主动开拓进取；能够学习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良传统，担负起重建社会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的责任。北京大学应该立足于研究型大学的定位，竭尽所能为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性发展提供最大的机会。

林建华指出，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北大要进一步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一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通过通识教育，启迪学生“懂社会、懂自己、懂中国、懂世界”，从而让学生理解生命的意义，做出符合天性的选择，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生活。同时，北大要充分发挥作为研究型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学术研究力量雄厚、学术气氛活跃等优势，在专业教育中提倡以发现和探究为中心的教学，鼓励教师、研究生、本科生踏上“共同探

索之旅”；打破学科之间的障碍，鼓励从学部层面来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要在课程中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学生获得过硬的交流与沟通能力；创造性地运用信息技术，以适应当代学生的学习方式变化。林建华说，我们既不可能照搬博雅（liberal arts）教育模式，也不能死守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而是要探索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使学生真正体验到北大多学科的丰富内涵和魅力，使本科生教育成为一个探索、发现和创造的过程，使学生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富于想象、热情洋溢的创造力。



林建华作讲座

林建华强调，北大本科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探索适合研究型大学特点的教育模式，使本科生更加得益于研究型大学独一无二的机会和资源，使学生能够真正体验北大学科综合、实力雄厚的魅力，既具有人文素养，又具有科学精神，既有良好的学科基础，又有跨

学科思维能力。林建华说：“我认为，衡量本科教育是否成功，就要思考这种教育是否能使学生永远保持信心、好奇、激情和进取。”

谈到创新创业教育，林建华说，北大要开展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企业家精神认同教育，同时鼓励和支持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

最后，林建华也希望北大的毕业生要致力于推动人类思想进步、推动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人类经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演讲结束后，林建华还与现场的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文/新闻网记者 张宁）

背景链接：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大讲堂”是学校通识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互动活动之一，旨在与通识核心课程、通识教育沙龙、通识教育讲座、《通识教育通讯》“通识联播”微信平台等共同推进通识教育理念的传播，为师生提供交流机会，探索新型的教育改革方式。“通识教育大讲堂”每年举办1-2期，将邀请重量级嘉宾出席，阐发通识教育理念，并就通识教育相关问题展开对话，为大学教育改革指明方向。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安宁

北京大学举行第三届人才论坛，助力学术科研人才培养与输送

12月2日上午，北京大学第三届人才论坛暨2015博雅奖章颁奖仪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学术科研领域重点用人单位代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人事教育部部长刘瑞根，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副教务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数学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张平文，学生工作部人民武装部部长张庆东，教务部部长董志勇，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明利，校团委副书记王逸鸣，优秀毕业生代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住院医师徐奔，以及各院系就业工作负责老师和学生代表等参加论坛。论坛由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陈永利主持。

叶静漪在致辞中表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也是大学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志。本次人才论坛借鉴前两届论坛的经验做法，以屠呦呦校友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为契机，提出北京大学“人才塔”战略，重点关注学校与科研单位的全面战略合作，支持和鼓励北大毕业生特别是基础学科研究生到学术科研领域建功立业。

与会领导共同点亮以博雅塔为造型的“博雅之光”冰雕灯塔，表明全校相关部门将协同配合，全力推动北大学生

从事科研学术工作，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照亮前程，从而正式启动北京大学“人才塔”战略。



“人才塔”战略启动仪式

研究生导师代表张平文在讲话中指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中国高校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方向。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标准之一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研究生导师不仅要全力以赴地指导学生的科研学习，还要义不容辞地帮助学生找到个人兴趣和发展方向，为他们的深造交流搭建平台，为他们的就业发展出谋划策。

重点用人单位代表刘瑞根表示，北大毕业生在我国国防事业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建设发展历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感谢北京大学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协作。他详细介绍了中物院的基本情况，

希望能够通过科研合作、实习考察、就业推荐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北大的人才合作，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投身国防事业。

优秀毕业生代表徐奔分享了高校学生从事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有志于此的在校生能够坚持学术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并对学校研究生科研工作提出建议。

毕业生培养和输送离不开院系就业工作教师的努力和付出。本次活动特别表彰了近五年乃至十年来为毕业生就业成才辛勤付出的院系负责教师，并向 10 位院系教师集体颁发 2015 年度博雅奖章。



博雅奖章颁奖仪式

据悉，北京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以“多元发展、集体成才”为指导思想，经过对十年来毕业生就业单位分析，归纳出北大毕业生五类重点就业方向：政

府机关、公司企业、科研院校、新闻媒体以及公益组织。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计划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分别对每类用人单位进行对接与拓展。2013 年第一届人才论坛提出“人才林”工程，逐步实现学校与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组织人事部门开展定向选调或人才引进项目；2014 年第二届人才论坛启动“人才海”计划，与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建立人才战略伙伴关系并设立奖励基金；今年第三届人才论坛以“人才塔”战略为基准，瞄准科研院校以及学术机构领域，重点探讨如何培养与输送学术科研人才。未来两年的人才论坛将陆续搭建学校与主流新闻媒体以及国内外公益组织的交流平台，最终通过若干年的持续建设和努力，构建面向各关键领域和发展前沿的北大毕业生发展空间以及学校人才交流合作体系。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陈汝东：田园诗是中华话语文明的发展方向

2015年12月3日，“当代中国话语研究”高层论坛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论中国话语文明的历史走向”的演讲。



会议现场（发言人为陈汝东教授）

“话语，是一种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是社会沟通的桥梁，是意识、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陈汝东教授在演讲中表示，“在学术范畴中，话语已从个体演化到社会乃至国家传播的核心范畴，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和国家战略语汇。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建构中国的国家话语体系和全球话语体系，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话语正在成为统领中国发展的核心范畴，成为社会整合、融合的桥梁。”

陈汝东简要剖析了话语形态的演化历程，论证了中国话语文明的“围墙式思维偏向”以及田园诗质性，剖析了中国话语文明的历时和共时走向，探讨了全球话语文明的发展趋势。“中国话语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折射了中华文明的物理空间、意识空间、文化空间以及文明空间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话语已突破了传统藩篱，逐渐具备全球思维。‘孔子学院计划’‘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反映了中国话语在物理、意识、政治、文化、经济等空间上的全球战略布局。”

田园话语文明，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中国话语文明的重构，需要突破和超越，需要以全球话语体系为坐标，实现物理与意识、官方与民间、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虚拟、国家与普世、区域与全球等多重空间的有机统一与融合，必须实现国家和民族意志与人类意志的统一，引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但意识、文化、文明空间却是无限的。中国的话语文明应更加重视在虚拟空间中的建构。

话语已成为连接各学科、融会学术与社会发展的桥梁。话语学已由语言学

科向跨学科、综合学科方向发展。从“个体学术”“群体学术”“行政学术”到“公共学术”“国家学术”“普世学术”是学术话语发展的趋势。建构“国家学术话语体系”“公共学术话语体系”“普世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话语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陈汝东这样概括。

本次会议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商务英语研究所主办，该所冯捷蕴、苗兴伟、田海龙等教授分别主持了会议。来自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该校英语学院院长王立非、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等到会致辞。

本次会议的议题涉及中美国防话语、中韩外交话语、医患话语、国际商贸话语以及话语文明等话语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议题。浙江大学施旭，中国传媒大学赵雪，外交学院崔长青，对外经贸大赵鸿燕、檀有志、冯捷蕴等学者，分别作了题为“中美国防战略的文化话语研究”“言语行为理论视域下医患打断话语研究”“巧用修辞：增强对外翻译与传播话语的隐蔽性与渗透力”“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视像话语”“中国国际话语权：争而不争与不争而争”“跨国公司中的话语权力研究”等发言。（文/全球修辞学会秘书处 张倩）

来源：央视网

编辑：白杨

北京大学 2016 新年中外新诗公益朗诵会举行

（中新网 12 月 2 日电）1 日晚，由繁星诗社、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北京大学爱基金主办，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协办的“乘着歌声的翅膀”2016 新年中外新诗公益朗诵会暨北京大学第三届志愿文化节 PKU 志愿树行动启动仪式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叶静漪和北京大学爱

基金创始人谢建华、繁星诗社发起人李晓雯等社会各界人士和北大师生一起参加了本次诗会。

新年公益朗诵会由“白鸟”“会唱歌的鸢尾花”“圣殿般的雪山”与“乘着歌声的翅膀”四部分组成。濮存昕、乔榛、濮存昕、高明、瞿弦和、陈铎、元杰、邱思婷、刘芳菲、吕薇、陈虹、

金波、叶尚霖、张乐、张钟中、迪里拜、费佳、杨梦迪等嘉宾倾情登台，呈现出一场诗歌与音乐的盛宴。朗诵会以艺术家们合诵的海涅的经典诗歌《乘着歌声的翅膀》结束。



在活动中，叶静漪宣布 2015 年北京大学第三届志愿文化节 PKU 志愿树行动启动，并与嘉宾共同点亮了象征北大志

愿文化繁盛长青的“PKU 志愿树”。北大的师生代表与现场的嘉宾们围绕“文明新风”“社区服务”“支教扶贫”“敬老助残”“爱随我行”“赛会典礼”等六大主题，共同发起了公益倡议，号召同学们投身志愿服务，用每个人的点滴奉献让北大志愿树枝繁叶茂，志愿精神遍地开花。

据悉，“12·5 国际志愿者日”前后，北京大学将集中开展第三届志愿文化节系列活动，在北京大学爱基金的支持下，从校园建设、人文关怀、公益创新等多方面推动北京大学志愿公益事业的建设，助力高校青年志愿者成长。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江南

“我问白说”北大学子对话白岩松

12 月 6 日，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到访深圳研究生院，并于汇丰商学院大楼报告厅以“我问白说”为题，与 2015 级财经传媒硕士班开展了一次激烈的头脑风暴和精彩的对话。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深圳研究生院院长（代）海闻教授，深圳研究生院财经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徐泓教授出席本次活动。

下午 6 点半，白岩松准时来到报告厅，全场顿时掌声雷动。此时，报告厅

已是座无虚席，不但观众席早已坐满，观众席两侧及后方也挤满了旁听的人群，汇丰商学院大楼 5 层的两个现场直播厅也坐满了人。开场伊始，徐泓先向大家介绍了白岩松，并表达了热烈的欢迎之情。随后，海闻代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向白岩松颁发聘书，正式聘请他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兼职教授。



与北大结缘 关注教育事业

白岩松提到，他和北大是有缘分的，他在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担任了十余年的特聘研究员，可以说是半个北大人。随后，财经新闻专业的学生正式开始与白岩松进行问答式的对话。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我问白说”微博互动环节，主持人挑选现场的微博内容向白岩松提问。在两个小时的对话时间里，白岩松总共回答了近 20 个问题，涉及新闻、教育、读书、学术、生活等各方面。

在讲座中，白岩松说道：“现在教育是我的主业，主持则是副业。”不难看出他对现代新闻教育的关注。白岩松主张，新闻必须是基于对事实的报道，对事实的追求应该是新闻人的底线而非上限。在他看来，30%的新闻天生具备头条魅力，剩下 70%的新闻如何展示给大众就需要新闻人来作抉择，这非常重要，

也很关键。白岩松一贯主张“新闻应该有温度”，冷冰冰的新闻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融入人本情怀的新闻才是众望所归的新闻。新闻人要有自己的风格，“什么是头条”很重要，但是选择头条的原因更重要。新闻人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当观众接受了新闻人所选择的“头条”时，栏目专题才会变得有意义。



提倡多读书 从书中收获智慧

白岩松非常喜爱阅读，他提倡“不光要立足当下，更要追溯历史”。他认为，一味地追求当今的流行，我们所能收获的只是少量的珍珠和大量的沙砾，只有回归历史，我们才能拥抱更多的珍珠。他向在场的观众推荐了他喜爱的书目，并强调有太多太多的好书等待我们去阅读——“通过对经典书目的阅读，我们不只是获得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收获智慧。”他提到，知识并不等同

于智慧，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立场和判断；不急于下判断，更不能轻易因为别人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白岩松从读书中收获解放和自由，他认为“舒服最重要”，不光是穿衣要舒服，做人更要“舒服”。一味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只会让自己陷入枷锁之中，做好每一件自己该做的事情，是自己的责任。

晚上 8 点半，活动进行到了尾声，白岩松以《道德经》中的“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一句结束了谈话，他把这句话赠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

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真正现场见识了“名嘴”白岩松的风趣机智和睿智深刻，受到了很多启发。

次日早上 9 点，白岩松又与深圳研究生院 2015 级财经传媒硕士班的同学就新闻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回答了同学们关于新闻写作、新闻价值判断等相关问题。同学们兴趣盎然，下课后，讨论仍在继续。“大师身旁易聆教，镜湖畔好读书。”一位同学课后如是说。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北大举办纪念“一二·九”运动 80 周年

暨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师生歌会

80 年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北京大学师生在这段救亡图存的峥嵘岁月中矢志报国，浴血奋战，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国家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12 月 5 日，为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爱国精神，北京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 80 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 70 周年师生歌会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今年共有来自 26 个院系的 22 支队伍参赛。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常务副校长吴志攀，副校长王杰，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敖英芳，党委副书记叶静漪，校长助理、工会主席孙丽等领导莅临现场，哲学系 94 岁高龄的杨辛教授以及来自香港的北京大学

中国研修班同学会的学长们也应邀来到现场观看演出。来自总政歌舞团合唱团、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担任比赛评委。今年比赛特别邀请到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柴璐担任嘉宾主持。



北京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师生歌会现场

今年的师生歌会分为甲、乙组两场进行。歌会以各院系合唱为主要形式，融合舞蹈、乐器伴奏、朗诵、情景表演、多媒体等多种艺术手段，生动展现了当代北大人的时代理想与家国情怀。

比赛部分结束后，评委根据各参赛团队的演唱效果、舞台表现、创新项目等方面分别评选出了甲、乙两组的一、二、三等奖。经济学院和城市与环境学院分别获得甲、乙组的冠军。由各院系领导和师生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审团还评选出了“最具院系特色奖”“最佳视频奖”和“最富感染力奖”等奖项。

11月24日—12月5日间，校团委通过“文艺燕园”微信平台的“声动‘一二·九’专栏”开展了“最美三行情诗”投票活动。各院系均提交了一首展现自己院系特色的“三行情诗”，在公众平台上进行展示，接受广大师生的投票。

“最美三行情诗”奖也在师生歌会上予以公布。今年的投票活动吸引了在校师生、校友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累计阅读数达到20万，投票数超过13万。此外，今年校团委还在总结去年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活动形式，特别策划了“一二·九”历史知识竞赛，帮助广大师生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国人民艰苦卓绝抗日战争的历史。“三行情诗”活动和历史知识竞赛的举行，有效引导了广大学子深入思考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向全社会彰显了北大人胸怀祖国、兼济天下的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使得今年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师生歌会更具有特别的意义。广大青年学生在这场活动中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and 理想信念教育，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和历史使命感。校团委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广大学生铭

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未天

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张婉愉荣获 2015 年度罗德奖学金

具有“全球本科生诺贝尔奖”美誉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s）于 12 月 7 日公布了 2015 年度获奖榜单。在全球超过 1.2 万名申请者中，北京大学法学院 2012 级本科生张婉愉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得该奖学金的四位中国大陆在读学生之一，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北京大学本科生。



张婉愉独立思考和学习能力突出，专业素养扎实，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国际交流项目，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综合素质出众。自入学以来，张婉愉先后获得了国家奖学金，美迈斯法学奖学金，北京大学新生奖学金、三好学生标兵、优衣库

奖学金，法学院贝克麦坚时奖学金、奋迅奖学金、众达奖学金等多项荣誉奖励，并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和校外律师事务所、社会公益组织中广泛参与社会实践、专业实习和志愿服务，展现出卓越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创新能力，在师生中赢得了极高的评价。2014 年 9 月，张婉愉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获选参加北京大学法学院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交换项目，其优异表现获美方师生一致好评。2015 年 2 月，张婉愉作为法学院代表队成员参加第 56 届杰赛普（Jessup）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与团队伙伴并肩协作，为北大法学院荣获中国赛区冠军并成功跻身全球 32 强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个人获评当年中国赛区“最佳辩手”。

罗德奖学金是英国政治家、商人塞西尔·罗德兹（Cecil John Rhodes）自 1902 年创设的奖学金，旨在资助“卓越、勇敢、仁爱以及拥有领袖气质”的世界青年精英赴牛津大学深造。获奖者被称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s），

其评定标准包括学术表现、个人特质、领导能力、仁爱理念、勇敢精神和体育运动等多方面。历届罗德学者中已产生了 40 余位极具全球影响力的国家领导人、30 余位著名军事家、70 余位跨国企业公司的董事长或执行长、10 余位诺贝尔奖得主、50 余位知名教育家等全球各领域顶尖人才。因其每年极低的录取率，“罗德学者”被视为全球影响力最高的青年荣誉之一。今年是该奖项首次面向中国大陆在读学生开放申请。

张婉愉荣膺“罗德学者”，展现了当代北大法律人的杰出形象，是北大法

学院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典型成果代表。法学院将以此为契机，继续致力于提升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开放思路，积极拓展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引导学生注重专业能力的培养和理想情怀的孕育，培养具有坚定信念追求和宽广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法律人才。（文/傅程榆）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活动举办

11 月 26 日，悉尼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贝琳达·哈金森（Belinda Hutchinson）女士、校长迈克尔·思朋斯（Michael Spence）教授率代表团 30 余人来校访问，举行“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校长王杰、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接待了代表团一行，并出席了“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相关活动。



活动现场林建华与贝琳达·哈金森、迈克尔·思朋斯交谈

上午，“北京大学悉尼大学日”开幕式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林建华在欢迎辞中赞扬了悉尼大学在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所获得的学术声誉，并回顾了两校的合作历程与长期友谊。北京大学和悉尼大学的合作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长久的交流中，双方增进了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解，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学子。

之后，思朋斯以“A University for China”为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了悉尼大学及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新颖办学理念及发展趋势，也使北大同学们对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特别指出，高等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为国家的未来领袖。大学教育一定不能抛弃基于本区域自身实际的研究，只有办好本国本民族的大学，才能办好世界一流大学。此外，他指出了协调大学各部门运转的重要性，大学的可贵之处在于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在这一意义上教师与学生都是学者。在演讲的结尾，他以发人深省

的反思总结——“教育”的涵义远比“教学”更广泛，任务也更艰巨。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北大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踊跃提问。在回答关于“优秀学生的特质”问题时，思朋斯指出，他所遇见的全世界最顶尖的学生都有共同的特质——善于倾听，并且善于就别人司空见惯的现象产生好奇和思索。他鼓励同学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融入更多的独立思考。

演讲会结束后，悉尼大学代表团与北大近 40 名学者在考古、对外汉语、经济、传播、管理、教育、社工等人文社科领域，工学、化学等理工学科领域，以及医学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商讨双方进一步合作事宜，加强联合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江南

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11月25日下午，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来访北京大学并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发表演讲。捷克驻华大使利博尔·赛奇卡、中国驻捷克大使马克卿、捷克查理大学校长托马什·济玛等一同来访。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副

校长李岩松、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李强等会见了捷克总理一行，并参加了演讲会。

会见中，林建华首先对总理及代表团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北京大学校史及目前院系概况。索博特卡总理表示，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且享

有盛誉的大学，随着捷中两国交流合作的加深，捷克的大学将会与北大有更密切的联系。林建华也表示了对未来合作的支持与期待。



林建华会见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

在演讲会上，林建华首先致欢迎辞。他说，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办学历史悠久，育人成果丰硕，国际交流频繁。捷克是文明之邦，也是世界著名的汉学重镇。北京大学高度重视同捷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传统友谊，愿意在人文交流、学生培养、联合研究等领域开展合作，这也符合北京大学的学科发展布局和总体发展战略，是双方共赢之举，希望以索博特卡总理此次来访为契机，翻开北大与捷克高等学府间合作交流的新篇章。

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总理在演讲中介绍了捷克的历史与文化，以及捷克在发展现代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重

点阐述了欧盟的发展现状与面临的挑战。他提到，欧洲一体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确保欧洲乃至全球的繁荣，处于发展十字口的欧盟必须齐心协力迎接挑战、解决问题。欧洲与中国在能源、经贸、环保、教育等领域有非常大的合作潜力，这其中，教育领域的合作能够极大地推进文化交流，有利于增强共识、增进理解，意义重大。

在互动环节，索博特卡总理回答了现场学生们提出的关于欧洲难民、恐怖主义、区域争端、两国学术合作等方面的问题。

演讲结束后，校长林建华与查理大学校长托马什·济玛举行会谈。托马什·济玛表示，查理大学与北京大学拥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查理大学与北京大学能够深化在战略性领域的合作，推进国际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林建华表示，北京大学非常重视开展中东欧区域研究，希望两校能够建立双向交流项目，深化和拓展合作的层次与空间。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舍予

网教之声

敢为天下先的大上海 终身教育是怎样突破的？

组建了终身教育处，搭建了网上学习平台，成立了开放大学、建立了学分银行，出台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360多万人在社区学习场所学习，占常住人口的15%左右。社区学习场所覆盖率达100%，人均社区教育经费超过10块钱……这是记者从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了解到的数字。自2006年启动，10年时间，上海市把终身教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在立法、理念普及、学习场所、学习平台、学习资源、学习制度等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

专访上海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处长庄俭的过程中，对上海市终身教育工作了解得越多，记者越觉得他那句“终身教育工作不是一场运动”非常经典。的确，这不是一场运动，需要相关工作人员保持一股韧劲，持之以恒地推进。以“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12个字为愿景，本着两个最朴实的想法——使更多人参与学习，为更多人提供教育服务，上海市目标明确、坚持不懈地推进终身教育工作，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全国终身教育工作名副其实的排头兵。

记者：设立首个省市级终身教育处、首个省级学分银行，上海市在终身教育方面的创新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对终身教育的需求更旺盛吗？**庄俭：**任何一种教育的发展一定是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需求相对应的，所以，这是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上海教育科研的力量相对较强，从而决定了上海比较早地引入、宣传、实践终身教育理念。

记者：上海的终身教育工作真正提上日程是什么时候？截至目前，取得了怎样的突破？

庄俭：回顾上海终身教育工作的进展，有大动作应该是2006年1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真正推进终身教育工作。实际上，这个文件出台之前的调研起草历时近两年时间，也就是说，从2004年开始，上海就成立了课题组，专门研究上海应该如何创建学习型城市。

记者：这个课题当时具体是由什么单位来承担的？

庄俭：时任的市委副秘书长牵头推动这项工作，由上海市委研究室、市政府研究室、市教委、市文明办、教科院等 5 家单位承担。我记得当时大概每两周就开一次会。可以说，从最开始，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就非常重视终身教育工作。

记者：从 2006 年到现在，甚至是从 2004 年到现在，10 年时间，上海终身教育工作最具突破性的成果表现在哪些方面？

庄俭：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终身教育理念有所普及，这个非常重要。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终身教育理念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10 年前的上海，你去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对于要不要做、由谁来做更是存有疑问。现在呢，大家对终身教育、终身学习都有所认识了。最有力的说明就是，市民的参与度翻了好几番。我们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大概 360 多万人在社区学习场所学习，占上海市常住人口的 15% 左右。据我了解，欧洲国家大概也就是 15% 这个数字。所以，就推与不推相比，我认为最大的突破是理念的普及。第二个突破是学习环境的改善。所谓三级网络建设，社区的学习条件改善非常大。原来没有学习场所，现在不仅有学习场所，学习场所覆盖率达到 100%，并且条件都

比较好。第三个突破是相对于过去来说，学习资源丰富了很多。此外，我们有了立法——《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建立了学习型社会建设与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搭建了上海学习网，成立了上海开放大学、建立了学分银行，这些事件应该说都是有所突破的。可以说，终身教育的各个方面工作在上海基本上都是落地的。

记者：和其他省市的终身教育相比，上海市的终身教育工作有哪些特色？

庄俭：各省的终身教育工作都有各省的特点。如果一定要说特色，我觉得是在顶层设计方面上海相对来说做得比较早。我刚才也提到，我们用近两年时间专门搞了一个课题，实际上是把上海原有的工作基础彻底摸透，从而明确了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做，从哪几方面推进，对下一步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在 2006 年的《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我们就提出“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这 12 个字很形象。随后这些年，终身教育的各项工作都是围绕“人人时时处处”开展的。目标明确是我们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坚持不懈。不是领导重视了抓一抓，然后就放下来了，我们是不断

地推进这项工作，因为只有不断推才有不断的积累，相对来说也比较落地。

记者：“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12个字是上海市推进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愿景？

庄俭：对。再简单的说，上海在推动这项工作过程中就有两个想法——使更多人参与学习，为更多人提供教育服务。

记者：通俗来讲，终身教育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那么上海教委终身教育处负责哪一段？承担怎样的职能？

庄俭：终身教育处从成立到现在，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从字眼来理解，终身教育肯定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教育。我觉得不要在乎这个名称，要推动终身教育发展，从现阶段来说，就要补短板。终身教育应该覆盖人的一生，我们检查一下还有哪里没覆盖到，是缺的。义务教育肯定覆盖了，高等教育也普及了，现在，这两部分我们都做得比较好，缺的就是对成人的非学历教育，还有社区教育、老年教育。我们终身教育处就是要做这些缺的事情。我们还要做各教育板块之间的沟通融合。要想成为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各教育板块之间就应该是无缝连接的，我们建设学分银行、搭建终身教育立交桥就是要实现这种无缝连接。此外，教育资源应该为社会服务，

社会资源也应该为教育服务，促进资源融通，即资源整合，我认为也应该是终身教育处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终身教育处的工作就是6个字——补短板，促融通。

记者：在“补短板，促融通”的实际工作中，您觉得哪项任务最艰巨？

庄俭：普及理念是最艰巨的。工作中我们发现，向市民普及理念相对容易，因为只要说出终身学习有什么好处，多数人都理解，难就难在管理职能的明确。从管理的角度说，管理部门条线非常清楚，职能越来越清晰，文化的就是文化，体育的就是体育，卫生的就是卫生。相反，终身教育讲的是资源整合、全社会参与。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会越来越细、越来越明确，而终身教育涉及到社会的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需要社会资源的整合、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凸显。

记者：您上面提到了《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这是继福建省之后，全国第二个关于终身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和福建省的终身教育法规相比，《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有哪些自己的特色？

庄俭：福建省的终身教育法规是2005年出台的，更多的是理念层面的，因为那

时还没有太多的实践。相形之下，《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更具体。2006年上海市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始终身教育探索，到2011年颁布《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期间历经5年时间。5年的实践探索，使得条例里的相关条款相对来说更具体了。当然，后面太原、河北、宁波的条例又比上海多了一些内容。

记者：在终身教育推动过程中，有还是没有政策法规推动的效果真的有很大差异吗？

庄俭：那当然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现在强调依法行政，如果没有政策法规，很难讲依法，工作就无法推动。终身教育在国家层面没有很具体的规定，地方如果也没有，那推进这项工作的依据是什么呢？实际上推进终身教育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特别是在依法行政的背景下，这一块相对来说缺少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过去，只要领导重视，有些工作还是可以推进的。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地方法规后，我们开展工作的底气就更足了；二，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好做法及时用条例的形式固化下来。譬如开展社区教育的职能是谁的？社区学院与社区学校要做什么？关系是什么？终身教育专职教师的

专业发展？诸如此类的，条例里面有相关的规定，职能明确了，人员成长通道畅通了，发展就有了保障，工作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在上海，在教师队伍中从事终身教育工作的教师的职称评定跟普通学校的教师是一样的。

记者：很多人一提终身教育就会想到社区教育，一提社区教育就说老年教育做得如何如何，您是如何理解终身教育这一概念的，它和社区教育、老年教育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庄俭：确实，在各种各样的文章里面，三个概念是混在一起的。我个人理解，如果终身教育是个体系的话，从教育提供者的角度来说有3部分——学校教育、工作场所的教育、社区教育，这三块构成了覆盖人的一生的教育服务体系。社区教育除了面向老年人外，还应该面向白领，面向学生，面向在岗但没有单位的人员，面向另外两块覆盖不到的人群，比如小商贩，钟点工，理想状态下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一说社区教育就想到老年教育呢，我认为是由我们社区教育现阶段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只能为老年人服务，吸引不了白领，也就是说你提供的教育，或者说你的能力，只能吸引一些老年人。上海市静安区现在已经有白领学堂，有白领学习联

盟，也就是说我们的社区教育已经开始关注这件事了。对于白领来说，与工作有关的教育肯定是由工作场所提供，但与生活相关的，譬如唱歌、跳舞、烧饭、带孩子，一定是由社区提供。这方面的需求也是很旺盛的，随着社区教育能力的提高，提供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多，未来一定会吸引白领参与。现阶段，说来说去肯定就是老年教育，但社区教育绝对不仅仅是老年教育。

记者：您如何看待终身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庄俭：我认为现状蛮好的，发展势头也不错，大家都动起来了。据我了解，大概全国 1/4 的区县都开展了社区教育工作，要真正把终身教育发展当中的那块短板补起来，这个很重要。当然，要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记者：结合上海的具体实践，有哪些经验和建议分享给其他准备或正在开展终身教育的城市？

庄俭：我认为第一目标要明确。不能今天说干这个，明天说干那个，大目标要非常清楚。第二，要结合实际。我还是

那句话，各省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能一味地照搬别人的经验，要结合实际。第三，要坚持不懈地推。终身教育工作不是一场运动，所以不能今年号召一下，3 年以后就不提了。既然要弄，就要坚持不懈地有序推下去。在推动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找到落脚点，我认为还是要有制度、法律法规的保障。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探索性的事情，老百姓喜欢，领导满意，当然很好，但是你做的依据是什么？哪条法律规定你可以这样做？所以一定要关注制度的建设。即使是做成功了，马上把它形成一项制度，有了制度保障，接下去就可以不断地推进了，否则很容易永远从零开始。福建 2005 年推出终身教育法规，上海是 5 年之后的 2011 年，但从 2011 年到现在，全国又有 3 个省市推出了自己的终身教育法规——太原、河北、宁波，还有许多城市正在酝酿当中，可以说速度加快了很多。我认为非常好，有了制度的保障，这件事不管进度快也好，慢也好，总会向前推进的。

来源：在线学习

记者：潘超

李英强：让教育回归“立人”的本质

导言

“无电之今夜，蕲春，烛光里的课堂。夜航船。年轻纯朴的心，视而不见的风浪。纪念，存照。愿世界安好！”这是青年学者熊培云在 2011 年 7 月 13 日晚上发的一条微博。

这个停电的晚上，熊培云作为立人大学的授课导师，正在给学生讲授“我的学思历程”。为了保证课程照常进行，义工和志愿者们买来了蜡烛，在课桌上、讲台边点燃。烛光摇曳中上课的场景，经网友的转发被誉为“最浪漫的一课”。

这是立人大学刚刚创办第一个暑期班的一个场景。那年，立人大学汇集了刘瑜、张健、熊培云、秋风等知名学者，与青年人一起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大学教育。当时，全国 17 个省市有 100 多名报名者，其中 80 人通过筛选得以赴学，甚至有个高中生，连续四天骑行 340 公里，从河南穿越大别山区赶到立人大学第一个暑期班所在地湖北蕲春青石镇。

然而，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下的大学，而是基于互联网的一所民间“大学”。

“以互联网为依托，发挥技术的力量，聚集一流的学者，为那些有心向学而被现行教育体制排斥的青年创造接受真正

大学教育的机会。”立人大学的创始人李英强说，立人大学有令许多正规大学都羡慕的师资。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和一群有着高远理想的大学老师汇聚到这个平台，或游学、或分享。

可立人大学的另一面，是没有校长，没有固定的管理团队，资金基本依靠公开的小额募款，甚至没有固定的教室，自费前来的导师，自主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地点。有的时候，乡野间空荡荡的河床，成了教学的场所，老师和学生幕天席地，谈论着胡适、探讨着柏拉图和理想国，一起吟诵诗歌、开读书会、仰望星空、排演戏剧……

在全国教育一盘棋的大环境下，这样一所民间大学的存在变得异常诡异。但也就是这样一所有着高远理想的民间大学，让很多年轻人能够零距离体验到与知名学者的学识探讨，感受到了真正的大学教育，以自由、开放的方式，探索民间高等教育的可能，让很多年轻人相信，精神是存在于象牙塔的。

“立人大学，只是过去立人图书馆项目的继续。”2007 年，作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李英强，28 岁，他毅然放弃北京的城市生活，回到家乡湖北蕲春

县青石镇建立了第一所乡村图书馆，取名“立人”。

“立人从一开始，就矢志于探索一条新的教育之路：这是一条青少年自我学习、自我解放、自我成人之路，这是一条让教育回归其本质功能——立人——的道路。”李英强说，这是借用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立人不是教育扶贫，而是精神取暖。立人不是理想国，而只是一座桥梁。这桥通向无尽的远方，连接着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这桥梁首先沟通的是城市和乡村，让城市的资源、人可以直接面向乡村，可以直接参与促进乡村社会的变革。

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中国乡村，教育水平滞后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而乡村文化的复兴希望在于青少年。无论是立人大学立人图书馆致力于中国乡村精神建设，以阅读为载体，通过推广国民阅读，促进乡村教育革新。

立人大学，从2011年暑期开始，已经连续三年在各地举办了暑期学校，常态项目有游学班、研修班以及学思分享会。而立人乡村图书馆，经几年的发展，借助社会的支持，已经在全国多个省份建立起来了13个“立人图书馆”，惠及乡村地区四万多名中小學生，今年还将继续新开2—3新分馆。（编者按：本访

谈时间为2014年5月。截止至2014年9月18日，全国22个立人图书馆全部关闭）许多志愿者受到感召，也踊跃加入乡村公民教育的行列。李英强和这些志愿者，以寂寞坚守，给那些精神世界里蛮荒成长的乡村孩子一个灵魂的出口。

教育的关键在于影响人的生命

马想斌：立人大学的规模虽然很小，时间也很短，但是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你怎么会想到办这样一所大学？

李英强：其实有这个想法应该说很早就有了。大概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们就有计划要做一个新式的大学。在我们的设想中，这个大学和传统的大学不一样，我们不需要有多么宏大的建筑，多少固定的老师，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学习和教学组织的方式。但因为当时有各方面的困难，比如资金、执行等等，所以一直没做，先做了立人图书馆。

在做图书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的读者，参与图书馆阅读的孩子们，逐渐慢慢长大，有的甚至经过一年的高考就要立即步入大学了，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读了不少好书，已经见过一些世面，已经相当具备行动力，那么接下来如何让他们把这种阅读经典、独立思考、

自主行动的习惯延续下去，便成了思考的问题。如果他们所进入的大学氛围，不足以影响他们能够坚持下去，该怎么办？他们将来发展的还不错，但是说实话这个社会今天教育要回应的问题没那么简单了，教育要回应的问题并不是要培养出一些成功者，事实上在今天这样一个很复杂的转型的背景下其实应该说很需要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的，历史使命感的人。

这便萌生了做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大学，资源的规模可能很小，但是可以能够影响到不少的青年人的成长，给他们提供一种新式的大学教育。在2011年上半年，便开始正式筹备这个事情，当年就开了一个立人大学的暑期班。

马想斌：那你认为什么是新式的大学教育？

李英强：我所理解的大学教育的新，其实在某个意义上讲是旧，所谓旧就是回到传统。近一点的是民国传统，稍微远一点是中国的书院传统，在西方的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大学最早开始产生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烈清晰的分工，没有那么细腻的学科化，那个时候大学它回应的问题其实是人的生命层面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式教育，只是说它在工具意义上的新，比如借助互

联网等等，但核心层面对教育的理解，依旧是很旧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例子，梁启超的学问远远超过了康有为，但梁启超一直奉康有为为师，这种学术想的传承它不是基于信息的，它是基于人格的。但是今天在现代化的教育里面这个东西丢了，现在大部分学校里，大学像一个卖场，老师像是一个卖东西的知识贩子，至于贩卖给你学生的东西学生是否弄懂了，跟他没有多少关系。

另外一个，在工具意义上是新的，但回归传统仍旧是旧的，那就是自主学习。今天的学习在很大意义上讲，不再是以前那样一种知识匮乏的时代，信息爆炸时代有许多或者说大部分的学习都是通过自己查阅资料等这些自主学习的方式去解决。但是我们的大学依然是用很传统的教学方式，这实际上效率非常低，而且在很多意义上讲有很多课程它就是无效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对阅读和行动同样的重视，用一个词概括叫“知行合一”。希望你学到的东西是有助于你的生命的，是你生命所需要的，是能回应你生命问题的。

第四个新式教育的特点，在立人大学上体现的很明显，那就是“一起办学”。在这里，学生和老师不是被组织起来的资源，你们是主体，你们就是大学的全部。这里，没有校长，没有现成的后勤人员、行政人员，整个教学过程就需要我们一起来做。老师通过这个平台，招到你想招的学生，讲什么内容，在哪里讲，都是你和学生来决定，真正实现导师自主招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期望回到书院教育的传统里，吟诵诗歌、开读书会、仰望星空、排演戏剧，探索了另一种教育模式。

让乡村少年成为健康正常的公民

马想斌：为什么要“立人”？立人所要立的是怎样的人？

李英强：最基本的解释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过另一个出处是鲁迅在一百年前说的“角逐列国事物，其首在立人，人立则凡事举”，鲁迅认为要立人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这正是我们首先要做的。

我们要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的认识就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把它定义的非常简单，我们希望这个人是一个公民，所以最早立人图书馆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一种公民

教育，无论是立人图书馆还是立人大学，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乡村青少年成长为健康正常的现代公民。健康正常的现代公民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有一个观点，应该是有情感，会思考，能行动，重品格的这样的人。

但现在问题是这些人所站立的根基在哪儿？原来我们以为人是可以实现自由、解放、平等这些东西的，但其实这些没有根基的。我们看到别的地方的人，实现了自由，我们就以为人应该实现自由，但人应该实现自由这个不足以成为人实现自由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因为他们实现自由是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根基，有他们的历史根基，但是我们是缺乏这个根基的。

马想斌：我们都知道，百年树人的过程中，导师很重要。之前有很多人，将立人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比，西南联大是大师云集。如今立人大学的老师，也都是当代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你们选择老师有没有什么标准？

李英强：立人大学的导师基本是在大学教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我们之前设置了三个门槛，首先是正儿八经读过博士的，或者高校的副教授（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学者优先）。教授一般就算了，因为可能比较忙，而我们希望他们

是真实参与的，不是挂名。另外我们希望他们能每年自费参加至少一次活动。

说大一点，我们是在尝试构建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学者，已经有这样的社会自觉。

马想斌：每年立人大学都会迎来很多人的报名，但是只是录取很少的人。你们在学员的选择上又是什么标准？

李英强：每一个学员进来之前都要填一份报名，其中有三个问题是我比较看重的：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期待？为什么参加立人大学的活动？为什么觉得自己会被录取？我希望他们能从不同的角度回答。有人说来参加立人大学是为了看到刘瑜，那就不会被通过，因为刘瑜不是明星，不要浪费其他人的报名机会。也有人回答说之前看过刘瑜的书，因此有些思考，想跟刘瑜当面交流，对于这样的人我们非常欢迎。

还有一种人我们会优先考虑录取，那就是偏远地区的学生，或者在二三流大学甚至不入流大学读书的学生。如果他们读过这些学者的书并且有自己的思考，我们是非常欢迎的。相反，人大、中大、中国政法大学这类重点高校的大学生，我们会先把他们放一放，因为他

们本身在学校这类的机会可能更多一些。

而往往这些学生表现的非常活跃，这种活跃可以说在任何一所大学都很难看到。还有一些人读书很多，思考深入。通过这些书，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对社会一定的理解。之后，他们利用我们提供的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平台，会组织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读诗会、比如电影赏析小组、出国党、话剧社……

乡村文化的复兴希望在于青少年

马想斌：2007年，你开办了立人乡村图书馆的项目，当时是怎样想的，又是如何认识今天的乡村教育？

李英强：当前乡村教育资源是很匮乏的，乡村也是更缺乏关注的。我看到这些年来，乡村教育的品质其实是在下降，虽然以前也是应试教育，现在也是应试教育，但现在即使同是在应试教育这个维度讲的话还是在下降。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做一点什么，为这种衰败的乡村教育填补一些资源进去。但是资源进去之后怎么样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立人是一个探索，不是说单纯给他资源，给他钱，给书，给他东西，立人是一种探索，通过基于阅读的自主学习提升乡村教育。

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在乡下的童年，几乎连一本像样的书都没读过，只能靠生活中的知人阅世来建立对世界的认识。城市里各种文化设施都很齐全，但是农村在这方面很欠缺，很多孩子连看书的地方都找不到，这种状况如果不主动去改变，可能会一直持续。而乡村文化的复兴希望在于青少年，如果乡村青年没什么希望，那么过 20 年、30 年、40 年乡村也不会有希望。

马想斌：通过你这些年的努力，你觉得达到实际效果了吗？或者，你预期的效果是怎样的？

李英强：这个实际效果很难说，但能说的是，只要阅读在图书馆里真实的发生，这个教育，这个自主成长就在真实的发生。你要知道以今天的教育环境来说，其实阅读本身不是一件特别有吸引力的事情，而我们的图书馆正常的情况下，每个月能够发生的真实的阅读次数大概在四万人次左右，13 个、14 个图书馆加起来有四万人次的样子。要知道，这些被阅读的书籍，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经典，所以它的效果不低于有四万堂课。但如果要说个确切的影响，很难表达。可能要等到过几十年，才能看得出来阅读在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想斌：有人说“立人乡村图书馆”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是乡村教育“乌托邦”。你自己如何看待？

李英强：我把这种评价看作是对我们的勉励，是对我们的褒奖。理想主义也许是有有点傻的一种评价，但是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假设没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努力，我们很多的困局、僵局、死局是无法突破的。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丰裕程度已经足够让每个人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可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它不在于吃吃喝喝，也不在于我们占有多少物质，而在于整个人从身体到心灵的自由。那这个自由确实跟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评价、估值是直接相关的。如果一个人不带有一点理想主义的话，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会活的非常乏味，是挺没劲的一件事情。

但从事实上来看，所谓的乌托邦并不存在。一种基于个人行动，个体生活实践的开放学习，不仅可以回应中国今天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教育问题，同样它是完全具备可操作性的，它不是一个不能够落地的一个乌托邦的想法。我们通过那些志于立人的人，打破书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让乡村少年阅读兴趣得以实现。

而通过这种可以实践的教育行动，使得“立人”成为我们的目标和教育的本质，而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去帮助我们年轻的子弟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坚持去关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和灵魂，坚持去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乡村青少年的成长，而不是我们粗略的一般去看他们获得到什么东西，包括获得的图书等等这些东西，那是一个很表面的东西。

重申教育主权属于父母和社会

马想斌：学校日益脱离社会，成为一个孤岛。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校看似越来越功利，社会什么专业热就开班什么专业，但实际上学校的知识越来越跟社会脱节。另一方面，立人所做的，从一定程度上，同样与这个功利化的社会是脱节的。你如何看待这两个方面，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

李英强：为什么这些大学所开的课程，设的专业，都是那么着急的想去迎合社会的需要，但是又迎合不上？很大原因讲我觉得本身跟做教育的人，对人的理解有关，对人的理解不同导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回应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你把人理解成是一个想要自我实现的高级动物，他需要得到欲望

的满足，他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最后你发现你不自觉的拥抱了成功学。

但是有另外一种理解，很有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成长，人是有不可转移，不可剥夺的独立的价值，人是有他不能毁灭、不能减损的尊严。当然对人持以这样一种理解，你会知道人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吃饭，人最重要的问题是真正实现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并且把这种理解活出来。

所以我们的教育，很多程度上不应该去回应“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挣钱”这个问题，它所回应的是：我是谁，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什么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的人生如何才能有价值、有意义？它会促使你回应这个问题，它也同时会帮助你来对抗这个世界已经呈现出来的一种单调性，它会告诉你这个社会是多元的，这个社会是有无数的可能的。而当你回应了这些问题，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的被这个社会的制度、文化，名利这些东西所捆绑，可以活得比较自由，同时你也会看到生活的多种可能性。

马想斌：所以，你觉得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指向“人”。

李英强：大学教育首先是指向人的，只是现在更多的大学指向了物质、工具的培养，这样的学校充其量能办成世界一流的培训学院。但我们都知道，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大学不是为了培养工具，而是为了人的发现、人的完善和人的完成。这个人必然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有批判性思维，有学习和批评的能力，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人有多多样性和丰富性，立人大学不是说要培养某一种人，更不是说为了培养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培养有开放的心灵和自由的头脑的人。你选择做什么，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喜欢自己的生活。

马想斌：也正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不应该是作为一种工具培养，当下出现了“教育自救”的现象。

李英强：我们看到，现在除了把孩子送出国外，很多没有能力送孩子出国，或者不想送孩子出国、不想移民的父母，开始“教育自救”了。许多人把自己的孩子从学校里面带出来，通过在家上学、私塾（主要是儒家学堂）、互助式家长学校、华德福学校、教会学校等途径为他寻找一种有意义的教育；还有一些人虽然没有让孩子离开学校，但是不再被应试教育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捆绑，开始

为孩子的成长寻找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也有许多人，开始寻求教育问题的解决之道，开始成立各种机构，提供各式各样的教育产品。

但教育自救，在不同的人那里存在着不同的困难：对于大部分的父母而言，观念的解放是最大的问题，过去的几十年的习惯，让无数家庭自动放弃在教育上的自主权，把教育视为理所当然的政府公共事务，把教育与学校划等号，以送孩子上学为完成教育义务。

所以教育自救，最重要的要从观念上打破任何力量对教育的垄断，重申教育主权属于父母和社会，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要承担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责任，而不是将教育简单交给政府，交给学校。其次就是，民间的教育力量，是要为社会各阶层所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教育自救”提供观念、思想和技术上的支持。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我们希望透过自身的努力，激发更多有识之士行动起来，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更加健康、正常的教育，让教育回归“立人”的本质。

来源：访谈取自《反解社会：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马想斌，刘晨/著，待出版），爱思想网授权发布

编辑：丁香的耳朵

■ 北大人物

杨立华：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1997年初冬的某个下午，我第一次讲授‘中国哲学史’。我的教学生涯始于一次偶然的代课。那天恰好讲张载。至今我还记得课程结束时的情景。在一教那间略嫌昏暗的教室里，窗外是冬日黄昏的暮色，眼前生动的脸孔上某种被点亮的东西，那一刻也永久地点亮了我。要有怎样的人生，才配得上那一刻的照亮呢？”

——杨立华《宋明理学十五讲·序》



周三下午3点钟，第七、八节课就要上课了。二教107的教室里早已坐满了人，找不到位置的学生在走道上徘徊。

这里是哲学系杨立华老师开设的“中国哲学史（下）”课，铃声响起，杨立华开始讲课。他的语速不是很快，时不时停顿一下，思考一下措辞，讲到激动之处，手便开始挥舞着指点江山。

“邵雍，这老头儿爱遛弯，洛阳城里的人为了时不时看到他，就沿着他遛弯的路线建房子，叫行窝……”他有时打趣一下哲学家们，有时吐槽一下自己，讲台下面总有阵阵笑声。

在哲学课堂上，杨立华的讲课是出了名的幽默风趣。网上经常有学生总结他讲课的语录，最近他的新书出版，同学们也纷纷寻找书中段子的遗留。“杨老师的课堂氛围很欢乐，不会困。”哲学系2012级本科生李培玮说。

对于大家眼中的“段子手”形象，杨立华似乎没有多少这样的自觉。他自称人到中年，现在讲课的风格更“理性和朴素”了。“我早期的上课风格很激

动，语速非常快。”回看当初，他颌首，说当时的想法比较极致，容易带来偏颇，“那时课堂感染力比现在要高，不过我现在不追求这个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研究的深入，杨立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语言的表达、思考的态度这些方面。

在杨立华的课堂上，风趣只是一种辅助的表达方式。讲起哲学家的生平，他总是讲故事一样，逗得满堂笑声；讲到文本与哲学思想，他又回归到严肃的表情，仔细剖析。没有 ppt，也没有教材书本，杨立华只在讲台上放一张薄薄的讲义，便能带着学生走进深入思考的哲学世界。

哲学系 2015 级研究生佟欣妍在本科蹭课时，偶然听到杨立华的“四书精读”课，完全改变了她对传统文本的僵化印象。她在杨立华的课堂上，总能完全被带动起来去反思和感受自身。

“有一年过中秋节，我本来已经不准备回家了。杨老师那堂课讲孟子，君子有三乐，其中一乐就是父母俱在，兄弟无故。杨老师讲这条的时候非常内切。”佟欣妍记得很清楚，那节课下课之后，她立马就改了主意，推掉所有的事情，买了张车票，临时跳上车回家和家里人过节。

无论是“中国哲学史”课还是“四书精读”课，杨立华的哲学课堂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渊博的知识、深入的思考、儒雅的气质、幽默的风格，学生们提到他，常常会直接用“男神”代称。

曲折往复的哲学之路

在大学本科三年级之前，杨立华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走上哲学这条道路。

出身于一个没有文科班的中学，杨立华听从父亲的意见去了浙江大学的工程热物理系。然而粗糙的实验室却让他提不起兴趣，“对锅炉十分绝望”。于是本科阶段杨立华便遵从着“三个月自由安排，一个月痛苦复习”的生活规律。这三个月里，杨立华几乎每周都有一天要和室友通宵打桥牌，至于通宵看电影、下围棋，也是重要活动之一。平时上课杨立华去的很少，他基本上在寝室“自学多年”，课余便是读各种书，尤其酷爱读小说，甚至想一边作电厂工程师一边写小说。他调侃着说，要是当初成功了，自己现在可能就是另一个“刘慈欣”。

“幸亏我们当时没有手机，否则按我这个玩法就完蛋了。”他大笑着回顾自己的“光辉”历史，还不忘开玩笑地“嫌弃”现在的学生，“我最不满意我

的学生的一点就是太规矩了，再不猖狂就老了。我年轻的时候多猖狂！”

小说家是没有当成，但是阅读却“误打误撞”地将杨立华引向了哲学的道路。

大三，他偶然看到了蔡志忠的《庄子》漫画，感觉“挺好玩儿的”，于是读了《庄子》原著，又找了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这一专著来看，从此开始对哲学产生了兴趣，在大三下学期毅然决定考北大的哲学系研究生。

亲人朋友都认为他不能成功，但是杨立华抱着一股冲劲：“我就是觉得自己能考上，很奇怪。”用着非北大编写的哲学教材，复习了四个多月，杨立华顺利地推开了燕园的大门，从此才算真正扎进了哲学的海洋。回忆本科的四年，杨立华觉得幸运而感恩，这段工科的经历给了他务实的精神，让他在之后的哲学研究中也从不蹈空。

“1992 是格外特殊的年份。时间与事件交织成难解的隐喻，宿命般展开。九月，入学。我拖着行李，推开了北大学生宿舍 46 楼 1084 的门。”杨立华在自己回忆学生岁月的文章《同门》里这样写道。进入北大哲学系之后，他的研究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由《庄子》入门的杨立华，很自然地选择了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中国哲学。

刚一进校，比别人少学了四年的基础差距就一下显现了出来，阅读量不够是杨立华遇到的最大问题。研一的时候他压力很大，整个人都很颓废，后来才逐渐找到感觉步入正轨。

“我真正开窍是在陈老师那几门课上。”陈来老师对杨立华的哲学之路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陈来老师带着学生具体地读中国哲学史材料，每本书都没有读完，却教会了学生读书的方法。一直以来，杨立华都在靠课下大量阅读来弥补哲学积累的薄弱。“上课读《传习录》下，那上、中你不读吗？《王阳明全集》都出了你不读吗？对吧！都要读。”提到读书这件事，他的语气变得毋庸置疑。

杨立华的哲学成长并不完全来源于书本。他喜欢看电影，喜欢崔健的歌，喜欢读诗，甚至自己写诗，学生时代的杨立华其实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王家卫、侯孝贤、周星驰、戈达尔，杨立华什么都看，还酷爱写影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颇有些邪门功夫”。杨立华对一部叫《北京杂种》的电影印象深刻，那部电影质量一般，却对他冲击极大。“因为里面的场景跟

我的生活差距极大，人能够直接感受到跟自己差距极大的生活的逻辑时，你的人生确实是扩大了。”哲学家面对人生思考的时候，人生经历是要足够丰富的，杨立华从看电影中得到思考，正是年轻时“格物致知”的过程。

“我的成长和人生的根本见解有关。杨立华这样评价自己。前后接受陈来先生和汤一介先生的教诲，杨立华研究生时研究儒学，到了博士时开始研究道教。三年的学习却让他发现“对道教比对锅炉还绝望”。“不喜欢，我学一遍就是为了学一个长生术？要能长生也还行，但他又没有。”杨立华的态度坚决，所以他研究道教都是观念式的，不研究思想，而是做了很多发展历史梳理与相关文献考证的工作。

在博士毕业留校之时，杨立华选择了放弃道教。当时有一个师兄劝他说：

“你都多大了你还转学术方向啊？”但是杨立华依旧果断，最后落点在儒家和哲学性比较强的道家上。“道学，长生之术？佛学，放下牵挂？我确实没法理解，怎么可能！”杨立华的基本人生信念是儒家的，跟随着内心的儒家基本价值观，他终于为自己曲折的哲学之路，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庄严温柔的哲学守护

杨立华的办公室茶几上摆放了一套青绿色的茶具，他边给记者演示茶具的用法边说：“其实我不用这个，太麻烦了，都是直接泡的。我也很少喝茶。”他放下茶具，笑着说自己喝咖啡多一些。对于中国传统式的东西，杨立华大部分都不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很西化。“没必要吧，不一定要长袍马褂（才是儒者）。”杨立华摊着双手。

“杨老师对儒家的理解不陈腐，有生命力。”哲学系2015级博士生秦晋楠形容杨立华的学术时这样说。

“我们始终要以理性的态度、现代人的自觉去看待儒家的思想。”杨立华认为对于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值得思考学习。儒家是理性的，它强调约束人的欲望，因为约束和节制了人的欲望，人的更富生趣的那一面才能出来。儒家始终关注的是生动活泼的生命。他引用程子讲《中庸》时的话：“‘活泼泼的’，就这四个字是儒家了不起的地方。”

不光是儒家思想，杨立华认为中国的文化特点就在于理性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高贵的地方，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人本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成就，杨立华一向很骄傲。然而说起现在的“儒学复兴”与“国学热”，他却显得不那么乐观。

杨立华谈到前两天看了半集《琅琊榜》，虽然吐槽说剧情婆婆妈妈，看不下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服装、礼仪、语言上确实像模像样了。“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经典的伟大，文化素养普遍提高，这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挺好的了。”他停顿了一下，“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普及的问题，而是道理没有讲清楚。”

年轻的时候杨立华遇到“百家讲坛”这样的节目就会直接拒绝，现在的他不开微博、不发朋友圈，博客也只更新过一阵子。“自己的哲学体系还没有立起来，普及什么呢？”他严厉地发问，再三说这样的普及是没有意义的，是会败坏人的。对于让小孩子上私塾这件事，杨立华表示公开地批评：“以为诵读诵读‘四书五经’国民素质就能提高吗？小孩子正本都能背下来，实际的语言能力却没有提升。”他的语气急切，音调提高，“教育只有一次，怎么敢随便来！”

“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守护在价值的根基处。”在杨立华眼里，当今这个时代最缺的是沉静的深入的思

考。“为时代立根，总得有人来做这件事，北大哲学系的人有比较高的自我期许。”杨立华以至少达到宋初三先生的高度为己任，就像哲学系吴增定老师评价的那样：“杨老师从不将哲学当做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视若生命，充满激情和现实关怀。”

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份期许，杨立华在对待学生的时候负责而严格。

曾经做中哲本科生导师的时候，杨立华便带着四、五个本科生开读书会。当时的学生之一，孟庆楠，现在已经成为哲学系的老师。“当时杨老师管的比较细。”孟庆楠回忆道。一个月一两次的读书会不仅让他们学到了读书与思考的基本方法，让他们在杨立华的安排下做了一些跟哲学相关的文献学、目录版本学的课题。“老师不会直接教，但是会安排训练。”这些训练对之后的研究都颇有裨益。

受陈来老师和汤一介老师的影响，杨立华的教学理念是“刻意不手把手教”，他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你想学，你兴趣在那儿，你有治学的志向，你就会一步步往前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他期待着被打败。

课下，杨立华是儒行社的老师之一。儒行社常常通过读书会、讲座、支教等活动传播学习儒家文化，杨立华也经常参与其中。

社团的一位同学意外去世，在他葬礼后一阵子，聚餐时，杨立华为他留了一副碗筷，点了一支烟，以示纪念。“那个场合能特别清楚的感受到，杨老师不仅是师长，更像是一个父亲般的情感上的对学生们的关怀。”佟欣妍对这件事印象深刻。

秦晋楠说老师是“既严毅又真性情”。杨立华不仅仅是想要把哲学知识传授给学生，更是身体力行地展现着对哲学的思考与守护。他希望孩子们上过他的课之后，能够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并且看到更多温暖、积极的东西。“我一直坚持，教大家怎么才能在消极中看到积极的因素，怎么在被悲观中坚持积极乐观的精神。”

为了表达对杨立华的喜爱，同学们喜欢亲近地称他为“杨子”。

“杨子”本来是杨立华读研时，和室友们开玩笑地互称为“子”而来。多年后在课堂上，他偶然提到了这件事，说：“我最大的追求是死后能在墓碑上刻下‘先儒杨子’。”这话被同学们记下，“杨子”的称呼也就在一代代学生间传了下来。

杨立华拍着大腿装作一脸严肃地批评：“这不是催我走嘛！”随后他话锋一转。“叫就叫吧，”他笑着说，“这反倒对我是一个激励，要不做出自己的哲学体系来我还不好意思。”

记者表示了对杨立华的感谢，说起上过他的课之后对自己有巨大的影响，让她对中国人身份有了高度自豪感，以后不论在哪一行都有底线，知道该坚持什么。

“今天我很得意。”杨立华正了正坐姿，认真地对她说。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李宇帆

张树华：一树芳华育桃李

“你们喝点什么呀？咖啡吧，你们年轻人都爱喝咖啡。”

记者来到张树华家里时，张树华夫妇已经在客厅等候了。夫妻俩热情地招

呼记者坐下，倒上两杯香醇的咖啡，热气腾腾，在逐渐氤氲开的馨香里，采访开始了。

张树华的回忆顺着她温文尔雅的语调，缓缓流泻出来。她脸上并没有多少皱纹，全然看不出八十多年的时光留在她身上的痕迹。



从“孑民图书室”到北大图专

早在中学时期，张树华就已邂逅北大的民主科学传统。

作为地道的北京人，张树华高中时代就读于北京第二女子中学。在动乱年代，青年学子总是敢为天下先。在解放前就有学生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女二中是当时比较进步的学校。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张树华也能感觉到进步同学的特立独行。“从她们为人做事，就觉得她们好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946年的北京还被称为北平，在学校里那些进步同学的介绍下，张树华每个周六都去北京大学参加活动——在当时的北大理学院的草坪上，张树华和同学们坐着，听北大学生会的同学给他们

讲一些对于时事的分析。在那个热情像火一样燃烧的年纪里，难得有这么意气相投的伙伴。“那时候就觉得参加这个活动以后回去心情特别舒畅。”

1947年9月以后，北大红楼一层的167房里每天学生们摩肩接踵。在地下党员陈宗奇与北大学生田觉狮成立的“孑民图书室”里，大学的同学和一批中学生共济一堂，共同读书。大家交流看法，碰撞思想。

当时还在上中学的张树华是“孑民图书室”的常客。正是在那个小小的图书室，她先后借阅了《家》《春》《秋》等进步图书。谈到这一段经历，张树华思绪流转，情不自禁地说道：“当时觉得整个社会特别黑暗，好像整天就生活在饥饿、动乱的边缘上，但是一到北大就觉得特别开心。”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到各个中学去作宣传，讲一些共产党的基本知识，组织学生迎接解放军进城。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张树华也在这些学生之列。解放军进城的时候，她们到前门举着小旗，鼓掌欢迎。“恨不得把手都要鼓肿了。”70年后，张树华依旧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潮澎湃。“觉得真是改天换地，好像是一下从黑暗进

到光明，迎接到了曙光，内心充满欢心鼓舞的激情。”

新社会、新气象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校内涌起“参军参干”的洪流，正在读高三的张树华也不甘落后，迫切希望为这个新社会做点什么。于是，她和班上的同学一起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准备跟部队一块到南方去参加革命。不巧的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张树华却因为生病住进医院，未能成行。看着身边同学一个个南下，张树华懊丧不已。直到1950年大学开始招生，在家养了一年病却依然一心想要“参干”的张树华抱着“找一个最短的学制，以便在毕业后继续献身革命工作”的心态，决定参加高考。

当时的张树华对于大学教育还是很懵懂的，因为曾经到北大“孑民图书室”借书的启发，她感到图书馆是非常圣洁的地方，可以充实人的知识、启发人的思维。而且当时的图书馆学专业是两年制的专修科，可以早点毕业参加革命工作。

在年轻的张树华眼里，考大学只是“参干”的一个策略。“就觉得有一搭无一搭，考上就上，考不上再想办法还是要去‘参干’。”大学入学考试那天早上，张树华起床后拿着个书包，从家

里带了个发面饼，喝了点水，就去参加考试了。然而就这样阴差阳错，一心想想要“参军参干”的张树华却在北京大学落地生根了。

“上了大学以后，就觉得图书馆学还是应当学。”这时对图书馆学科已经渐渐入门的张树华了解到，中国的文献特别多，但是中国搞图书馆学的人还是很少。当时只有北大武大两个系培养图书馆干部，图书馆学是缺人的专业。于是她就坚定地学下来了，为图书馆学奉献了一生。

1953年，张树华从改成四年制的北大图书馆专修科提前毕业。由于学校和系里都比较缺人，毕业之后张树华就留校任教了。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这一留就是45年。

“为革命好好工作”

1960年以后，张树华到门头沟的斋堂公社下放劳动了一年。在斋堂公社，他们要到山里去修路——用锤子把石头敲碎，把道路清理出来，还要经常下地劳动，一大早就扛着一个筐和锄头下田劳作。早上七点出工，晚上太阳落山了才能回来。

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张树华没有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最麻烦的事是拔小苗

儿，有的老乡把破布绑在膝盖上，整天在地里爬着。张树华她们就蹲着拔，但是即便是蹲着，一天下来也是非常辛苦。

“到后来我只要一蹲下，两个膝盖疼得就要掉眼泪。”

下放斋堂时，正值国家的困难时期，不仅劳动繁重，食物还严重匮乏。食不果腹，只能拿树叶充饥。吃得多了，倒也吃出了经验。当时他们把杏树叶放在缸里发酵去除杏树叶的苦味儿，将杏树叶和米一起搁在锅里煮。一碗饭里三分之二是叶子，三分之一是米粒儿。

那段经历虽然苦，回忆起来却不乏热情与温馨。张树华下放的村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独居老人，儿女都已经去世了。张树华在田里捆玉米秸的时候，就拿着两大捆玉米秸送给她，老人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在山上劳动时，张树华想着树杈比玉米秸更经烧，就背着两棵刚砍下来很粗的树杈，走几里山路送到老人家里。在他们劳动时，老人时常站在自家门口往山上张望，见了张树华总招呼她：“张，上我家来坐坐呀。”每次走的时候也都要说：“你常来呀。”三反五反的时候，年轻的同学们热情拳拳、情意深重，偶尔回学校，大家就一起聊聊近况。离开学校的时候大家都互相鼓励着：“为革命好好工作啊。”

“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1953年，张树华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当时的校长江隆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两条培养青年教师的途径：“跑圈”和“蹲点”。“跑圈”是在本专业范围内，把各门基础课都学一遍，打下比较广博的基础；“蹲点”则是针对确定的教学和科研内容，向专、深方向发展。当时，很多老先生都倾向于年轻教师要“跑跑圈”以拓宽知识面。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张树华跟随舒翼翬先生担任“图书馆学概论”课程的助教，又跟随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陈鸿舜先生担任“图书馆藏书建设”课的助教。

1956年，张树华开始独立讲授“图书馆服务”课程。1958年之后，她又开始讲授吸纳了“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馆服务”两门课程的“图书馆学概论”部分。就这样，在毕业留校后的六七年间，张树华在大图书馆学范畴内“跑了一圈”。这些业务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令她受益匪浅，使她对整个学科体系结构，学科里的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以及每个学科有待研究的问题，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孟子》有云：“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张树华非常认可这种治学方式。“在掌握了较广泛的基础知识之后，到一定时期就要收拢，要‘由博返约’，向某一专门方向发展，不可泛泛地搞下去。”20世纪80年代后，她给本科生讲过“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专题课，给研究生讲过“图书馆学史”。逐渐地，她转向对图书馆事业史和图书馆学术史的研究方向，使之“以约驭博”。在张树华的治学道路上，她一直努力践行“由博返约”“以约驭博”的治学道路。

为有源头活水来

图书馆学是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理论概括和总结。离开了实践的图书馆学研究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在谈到图书馆学研究的时候，张树华一直强调：“资料很重要，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总结和概括。”在学术研究中，她也一直是这一理论的践行者。

198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开始实施，张树华承担了“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的研究任务。作为国家的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拥有全国最全面的各类型图书馆。这意味着

张树华将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走访，有数量巨大的数据和信息等待她去搜集、整理。国家图书馆、区县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各个类型的图书馆都不能遗漏。甚至农村的图书室，她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们都曾去过。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她先后调查了500多所北京市各类型的图书馆。为了解解放前的图书馆概况，张树华还走访了几十位老馆员。这些老馆员，在解放前就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对解放前图书馆的情况比较了解。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调查，张树华搜集、整理、计算了大量的数据，撰写了35万字的稿子，《北京各类型图书馆志》一书终于在1993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2004年，非典席卷中国。为了避免传染，许多人深居简出。这个时候，中科院图书馆的陈源丞找到张树华，提出共同编写《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一书，张树华欣然同意。于是她就开始到北大图书馆、系资料室、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搜集资料。大事记都是按年编的，需要搜集好多资料。为了找到解放前的一些资料，除了走访一些老馆员来获取活的资料以外，张树华还跑到信息管理系资料室的角落，搜集那些解

放前的资料。张树华不厌其烦地一本本地翻阅这些资料。为了编“百年记事”，张树华基本上把信息管理系资料室里解放前的东西都翻过了。通过做卡片、做记录，张树华搜集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

解放前很多事情在期刊上反映得比较多，张树华查看了《中国期刊总目》，发现收藏解放前期刊最全的还是北大图书馆，连北图都没有这么多。为了了解解放前的期刊，张树华带着一名研究生，埋头钻进书库，将北大图书馆所藏的解放前有关图书馆方面的旧期刊 40 多种一一搬出来，了解每种期刊的创刊时间、创办单位、创办宗旨、刊期、主编人、栏目设置、主要内容、重点文章及特点等，然后做成卡片。张树华的一些著作，都是在这种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没有这些资料，我觉得根本就写不出来。”

生而有涯，学无止境

退休以后的张树华并未放弃学术研究工作。

“编完《中国图书馆百年记事》后，搜集来的将近一百万字的资料，都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资料性的东西。”于是在 2006 年，她开始编写《20 世纪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这本专

著论述了从清末民初中国图书馆的产生、解放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直到 21 世纪以后网络化、数字化图书馆的发展。其内容包括 100 多年间、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该书的内容包括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办馆观念的变化、各类型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进展、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图书馆协作组织的建立和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以及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发展历程等。

2013 年，张树华又编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和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论丛》一书。该书除讲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还重点论述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术渊源、解放前及解放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主要的图书馆学名著的简介和评述等。

“虽然我年事已高，但不甘心就此落后。”60 岁以后张树华开始参加计算机应用培训班，掌握最基本的计算机应用技术。同时她还关注图书馆界新技术应用的动向，阅读一些有关的书刊。在这种情况下，她写了《新技术革命与读者工作的变化》《从传统咨询服务走向网络咨询服务》《信息服务与知识导航》几篇文章。2006 年，她又与三位研究生

合作出版了《数字时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一书。

“时代在前进，我年龄虽大了，但起码在思想上、认识上不能落后太多，我希望自己在今后不多的日子里，尽量保持这种情绪和愿望。”

“要解决浮躁的问题，要踏踏实实地搞学问。”张树华说现在的人对网络很熟悉，但是根底不是很扎实，也不肯下苦功夫。“你真正想要做一个题目你就得从搜集资料开始，你的资料人家没有的你有，你就有创造性。如果都是从网上找的，人家都有了，难以做出新意。”

张树华对现在的年轻人别无他求。“你们在北大真的是应当趁这几年像海绵一样多吸收一些东西。”（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 陈敏）

记者手记：

我们采访张树华教授的时候，张老师已是82岁高龄。然而，无论是张老师慈祥的面容，还是她富有活力的声音以及说话时的神情，都无法让我们将她与

一位82岁的老人联系起来。张老师一生致力于学术，退休后仍不放松，进行了许多学术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果然，学术是会让人年轻的。

我们到张老师家中时，张老师的爱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秦珪教授也出来迎接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张老师偶尔会忘记某些人物的名字。这时她就一边喊着“老秦”，一边走到隔壁房间问，“你还记得……”。采访时张老师也不忘关照我：“你的咖啡都凉了吧，加点儿热水。女孩子可不能喝凉的东西。”

岁月和苦难没有在这个老人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却让她在八十多年的光阴里一直保持着一颗热忱与奉献的心。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学者谈读书

谭继和：谈读书

“为学必始于观书”，这是记者对年过七旬的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的印象。他家满屋都是书的世界，墙顶上还有“天府藏书家”匾额。大家心目中难免会勾勒出一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学究形象，其实，他是一个思想活跃、关心治事、受到很多市民和网民关注的著名文化学者。谭继和笑说自己从小读书至今天还在写书，是从未离开过书的一生，所以被人叫做“书生”。我们的话题也就从书生的阅读说起。

【“阅读”是人类求知初始习惯】

“阅读本来是人类求知最早形成的文化习惯，”谭继和感慨道：“但几千年后的今天，人类却面临丢失阅读习惯的危机，不幸的是一些中国人也卷入了不读书的潮流。”他认为“阅读”二字的本义，是指求知的过程。“阅”，据《说文解字》是指“具数于门中”。易经认为阅与脱、悦二字相通。指瓜熟蒂落、果实长成，在家门内把读有所获、心有所悦的东西如数家珍一样吐述出

来。“读”，《说文解字》释为“籀（zhòu）书也，从言，卖（dú）声。”籀，指不但能讽诵而且能解读书的意蕴。卖，有初始获知的含义，如读是指水的源头，犊是指初生动物，椟是木制外壳，读则是指言语初始。所以，阅读的本义是指言与语、眼与文的初次交汇。这个词是教人在家门内通过读书求知来观看外部世界，了解未知事物，每一次都要有如第一次一样有新鲜的感觉，能发现新的知识，求得新的感悟。读书就是求得知识、智慧、经验不断日新、又日新、与日俱新的过程。

【读书之路 上下求索方能开悟】

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谭继和认为，这句话表明读书的重要，它是立学和立身的根本。提升文明素质靠读书，净化自身灵魂靠书香。正如高尔基说的：“凡是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要一切归于书籍。如果没有书籍，我会在泥潭中被愚蠢和庸俗憋死。”

谭继和认为，读书之路漫漫其修远，离不开“上下求索”，是读者自身下苦功并逐步积累的过程，读书的乐趣也在于此。这个“求索”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对知识由渴求到追求，这是读书的动力；第二步是锻炼求索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反复阅读中获得的，是一个由“愚笨”到“聪明”的过程；第三步是在不断获取灵感过程中，思维“开悟”，等求索积累达到一定量后，知识便会融入自身的头脑与灵魂，成为灵性的火花与创新的源泉。

谭继和告诉记者，早在中学时期读《红楼梦》时，他都会将自己喜欢的诗句、成语和段落以及觉得有用的知识抄录下来，至今还成为潜移默化的思想养料，影响他的行文风格，可谓大有裨益。他说，只要开卷就有益，无论是纸质还是电子书，反复阅读，广泛涉猎，必于人品和学问有收获。

【蜀人爱阅读 全国独创省油灯】

汉代蜀文化曾达到“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境界。谭继和说，这靠的是文翁以人文化蜀，转型为书香阅读社会的风气。司马相如读书有远大的理想和宏观的视野。他读书要“包括宇宙”，上要知天文星空；“总览人物”，下要俯

察大地人文；“控引天地”，在大自然里自由翱翔；“错综古今”，让历史与现实错综生辉。扬雄读书“比肩相如”，作郎官时，自请停薪留职三年以便读尽金匱石室、兰台令史之书。诸葛亮诫子要多读书，“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宋代苏轼“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因为孔子的学问就是从“观书”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抽出几年专门读书的时间，到庐山五老峰下，藏书9000余卷的李氏山房“尽读其所未见之书”。杨升庵强学博览，百科综合，是明代读书著述第一人。

有趣的是，唐宋成都府邛窑和玉堂窑生产全国独一无二的省油灯，是专门为读书人红袖添香夜读书创制出来的，可见蜀人对书香的崇敬。不仅蜀中秀才如此，就是一般市民，如宋代成都、涪州草市上卖竹籬卖甜酱的老翁，也是边读易经边做买卖，还难倒了年轻的程颐、程颢，他两兄弟不得不佩服“易学在蜀”，足见蜀人书香阅读已成社会风气。

【书香阅读 才是历代民族文化主流】

谭继和先生并不反对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在人们生活压力

大，在工作之外喜欢娱乐怡人的文化，也无可厚非。但若因过于耽缅于怡人，而把民族历代传承的书香阅读社会习惯和风气丢掉了，却是民族的悲哀，文化立国的悲哀。”他认为，当下阅读问题存在三个弊端：一是“去阅读化”，浮躁情绪左右，功利目的为先，拼命抓取信息，以为信息就是知识，真正安身立命、精神家园所需要的知识和价值观却被丢掉了；二是阅读的低俗化，满足于声色犬马，戏弄历史，情字缺神，爱字缺心，庸俗浅陋；三是阅读碎片化，满足于心灵鸡汤，让一些名人把原典嚼成碎片，喂在自己口内，不愿花劳动去读解经典的原意，以致误导频袭，甚至精神扭曲还洋洋自得。

记者请谭继和谈谈如何纠正这些弊端。他说：“书香春色回天地，当今应该是呼唤书香阅读社会春天回归的时代。”他解释道，其实历史上每当商品经济繁荣时期，都易出现“去阅读化”问题。如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市民社会出现“束书不观”风气。苏轼就叹息：古时候书少，六经全靠手来抄写，读书不易，古人却想方设法求书来读。

而今人书可以雕版印刷，“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读书条件好了，后生科举之士反而“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他批判这种“去阅读化”现象，认为书是世间第一宝贵资源。苏轼说，珠宝可以悦人耳目，但不适用。米谷粮食颇为适用但用之即竭。只有读书，既可悦人耳目，又可万世用之不竭，无论智愚，只要肯读，就会有无尽收获。这句话对我们有相当警示作用。当今信息市场经济时代，又遇到宋代书籍转型时期一样的危机，遇到电脑代替书香、束书不观、游谈乱侃等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谭继和认为“去阅读化”只是新技术转型时期一股逆流，书香阅读才是历代民族文化主流。汉唐是书香阅读社会，尤其值得学习。当今百年民族文化复兴之际，呼唤汉唐书香社会和阅读雄风的春天回归，应该是当今时代最深刻的需要。

来源：成都日报
编辑：丁香的耳朵

老舍：谈读书

若是学者才准念书，我就什么也不要说了。大概书不是专为学者预备的，那么，我可要多嘴了。

从我一生长下来直到如今，没人盼望我成个学者；我永远喜欢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可是我爱念书。

书的种类很多，能和我有交情的可很少。我有决定念什么的全权；自幼儿我就会逃学，楞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对，《三字经》便可以代表一类——这类书，据我看，顶好在判了无期徒刑后去念，反正活着也没多大味儿。这类书可真不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犯无期徒刑罪的太多；要不然便是太少——我自己就常想杀些写这类书的人。我可是还没杀过一个，一来是因为——我才明白过来——写这样书的人敢情有好多已经死了，比如写《尚书》的那位李二哥，二来是因为现在还有些人专爱念这类书，我不使得罪人太多了。顶好，我看是不管别人，我不爱念的就不动好了。好在，我爸爸没希望我成个学者。

第二类书也与咱无缘：书上满是公式，没有一个“然而”和“所以”。据

说，这类书里藏着打开宇宙秘密的小金钥匙。我倒久想明白点真理，如地是圆的之类；可是这种书别扭，它老瞪着我，书不老老实实的当本书，瞪人干吗呀？我不能受这个气！有一回，一位朋友给我一本《相对论原理》，他说：明白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下了决心去念这本宝贝书。读了两个“配纸”（英译音：页——编注）我遇上了一个公式。我跟它“相对”了两点多钟！往后边一看，公式还多了去啦！我知道和它们“相对”下去，它们也许不在乎，我还活着不呢？

可是我对这类书，老有点敬意。这类书和第一类有些不同，我看得出。第一类书不是没法懂，而是懂了以后使我更糊涂。以我现在的理解力——比上我七岁的时候，我现在满可以作圣人了——我能明白“人之初，性本善”。明白完了，紧跟着就糊涂了；昨几个晚上，我还挨了小女儿——玫瑰唇的小天使——一个嘴巴。我知道这个小天使性本不善，她才两岁。第二类书根本就看不懂，可是人家的纸上没印着一句废话；懂不懂的，人家不闹玄虚，它瞪我，或者我是

该瞪。我的心这么一软，便把它好好放在书架上；好打好散，别太伤了和气。

这要说到第三类书了。其实这不该算一类；就这么算吧，顺嘴。这类书是这样的：名气挺大，念过的人总不肯说它坏，没念过的人老怪害羞地说将要念。譬如说《元曲》，太炎“先生”的文章，罗马的悲剧，辛克莱的小说，《大公报》——不知是哪儿出版的一本书——都算在这类里，这些书我也都拿起来过，随手便又放下了。这里还就属那本《大公报》有点劲。我不害羞，永远不说将要念。好些书的广告与威风是很大的，我只能承认那些广告作得不错，谁管它威风不威风呢。

“类”还多着呢，不便再说；有上面的三项也就足以证明我怎样的不高明了。该说读的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话是怎么来着？”

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姻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姻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整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还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过儿子。有个

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

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来源：文学网

编辑：丁香耳朵

好文共赏

屠呦呦瑞典演讲：青蒿素是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人民网斯德哥尔摩12月7日电(记者 李玫忆 刘仲华)

12月7日下午1点，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医学礼堂举行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演讲，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和美国爱尔兰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分别就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演讲。屠呦呦在演讲中介绍了自己获奖的科研成果，赞扬了中国科学家的团队精神，并呼吁全球科学家对疟疾病毒已经对青蒿素产生了抗药性多加关注并研究解决方案。



屠呦呦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医学礼堂发表演讲

讲话全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尊敬的获奖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极为荣幸能在卡罗琳斯卡学院讲演，我报告的题目是：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在报告之前，我首先要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诺贝尔奖基金会授予我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在短短的几天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瑞典人民的热情，在此我一并表示感谢。

谢谢威廉姆·坎贝尔和大村智二位刚刚所做的精彩报告。我现在要说的是四十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事。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关于青蒿素的发现过程，大家可能已经在很多报道中看到过。在此，我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这是中医研究院抗

疟药研究团队当年的简要工作总结，其中蓝底标示的是本院团队完成的工作，白底标示的是全国其他协作团队完成的工作。蓝底向白底过渡标示既有本院也有协作单位参加的工作。

中药研究所团队于 1969 年开始抗疟中药研究。经过大量的反复筛选工作后，1971 年起工作重点集中于中药青蒿。又经过很多次失败后，1971 年 9 月，重新设计了提取方法，改用低温提取，用乙醚回流或冷浸，而后用碱溶液除掉酸性部位的方法制备样品。1971 年 10 月 4 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 No. 191 的样品，以 1.0 克/公斤体重的剂量，连续 3 天，口服给药，鼠疟药效评价显示抑制率达到 100%。同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抑制率 100% 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1972 年 8 至 10 月，我们开展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研究，30 例恶性疟和间日疟病人全部显效。同年 11 月，从该部位中成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化合物的结晶，后命名为“青蒿素”。

1972 年 12 月开始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进行探索，通过元素分析、光谱测定、质谱及旋光分析等技术手段，确定化合物分子式为 $C_{15}H_{22}O_5$ ，分子量 282。

明确了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类化合物。

1973 年 4 月 27 日，经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分析化学室进一步复核了分子式等有关数据。1974 年起，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生物物理所相继开展了青蒿素结构协作研究的工作。最终经 X 光衍射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确认青蒿素是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立体结构于 1977 年在中国的《科学通报》发表，并被《化学文摘》收录。

1973 年起，为研究青蒿素结构中的功能基团而制备衍生物。经硼氢化钠还原反应，证实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发明了双氢青蒿素。经构效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高。

这里展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蒿甲醚、青蒿琥酯、蒿乙醚的分子结构。直到现在，除此类型之外，其他结构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还没有用于临床的报道。

1986 年，青蒿素获得了卫生部新药证书。于 1992 年再获得双氢青蒿素新药证书。该药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 10 倍，进一步体现了青蒿素类药物“高效、速效、低毒”的特点。

青蒿素引起世界关注

1981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北京联合召开疟疾化疗科学工作组第四次会议，有关青蒿素及其临床应用的一系列报告在会上引发热烈反响。我的报告是“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数千例中国的疟疾患者得到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有效治疗。

听完这段介绍，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一段普通的药物发现过程。但是，当年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沿用历史的中药青蒿中发掘出青蒿素的历程却相当艰辛。

目标明确、坚持信念是成功的前提。1969年，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参加全国“523”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经院领导研究决定，我被指令负责并组建“523”项目课题组，承担抗疟中药的研发。这一项目在当时属于保密的重点军工项目。对于一个年轻科研人员，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

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

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指导我鉴别药材。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遇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

信息收集、准确解析是研究发现成功的基础。接受任务后，我收集整理历代中医药典籍，走访名老中医并收集他们用于防治疟疾的方剂和中药、同时调阅大量民间方药。在汇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2000余内服、外用方药的基础上，编写了以640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关键的文献启示。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公元3-4世纪）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关于青蒿入药，最早见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后的《神农本草经》《补遗雷公炮制便览》《本草纲目》等典籍都有青蒿治病的记载。然而，古籍虽多，确都没有明确青蒿的植物分类品种。当年青蒿资源品种混乱，药典收载了2个品种，还有4个其他的混淆品种也在使用。后续深入研究发现：仅 *Artemisia annua* L. 一种含有青蒿素，抗疟有效。这样客观上就增加了发现青蒿素的难度。再加上青蒿素在原植物中含量并不高，还有药用部位、产地、采收季节、纯化工艺的影响，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中国传统中医药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多加思考，发掘提高。

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

七十年代中国的科研条件比较差，为供应足够的青蒿有效部位用于临床，我们曾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由于缺乏通风设备，又接触大量有机溶剂，导致一些科研人员的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为了尽快上临床，在动物安全性评价的基础上，我和科研团队成员自身服用有效部位提取物，以确保临床病人的安全。当青蒿素片剂临床试用效果不理想时，经过努力坚持，深入探究原因，最终查

明是崩解度的问题。改用青蒿素单体胶囊，从而及时证实了青蒿素的抗疟疗效。

团队精神，无私合作加速科学发现 转化成有效药物

1972年3月8日，全国523办公室在南京召开抗疟药物专业会议，我代表中药所在会上报告了青蒿 No. 191 提取物对鼠疟、猴疟的结果，受到会议极大关注。同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上，我报告了30例临床全部显效的结果。从此，拉开了青蒿抗疟研究全国大协作的序幕。

今天，我再次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铭记他们在青蒿素研究、发现与应用中的积极投入与突出贡献。感谢全国523项目单位的通力协作，包括山东省中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我衷心祝贺协作单位同行们所取得的多方面成果，以及对疟疾患者的热诚服务。对于全国523办公室在组织抗疟项目中的不懈努力，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没有大家无私合作的团队精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将青蒿素贡献给世界。

疟疾对于世界公共卫生依然是个严重挑战

WHO 总干事陈冯富珍在谈到控制疟疾时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减少疟疾病例与死亡方面，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成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如此，据统计，全球 97 个国家与地区的 33 亿人口仍在遭遇疟疾的威胁，其中 12 亿人生活在高危区域，这些区域的患病率有可能高于 1/1000。统计数据表明，2013 年全球疟疾患者约为 19800 万，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约为 58 万，其中 78% 是 5 岁以下的儿童。90% 的疟疾死亡病例发生在重灾区非洲。70% 的非洲疟疾患者应用青蒿素复方药物治疗（Artemisinin-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Ts）。但是，得不到 ACTs 治疗的疟疾患儿仍达 5600 万到 6900 万之多。

疟原虫对于青蒿素和其他抗疟药的抗药性

在大湄公河地区，包括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恶性疟原虫已经出现对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在柬埔寨-泰国边境的许多地区，恶性疟原虫已经对绝大多数抗疟药产生抗药性。请看今

年报告的对于青蒿素抗药性的分布图，红色与黑色提示当地的恶性疟原虫出现抗药性。可见，不仅在大湄公河流域有抗药性，在非洲少数地区也出现了抗药性。这些情况都是严重的警示。

世界卫生组织 2011 年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这项计划出台的目的在于保护 ACTs 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鉴于青蒿素的抗药性已在大湄公河流域得到证实，扩散的潜在威胁也正在考察之中。参与该计划的 100 多位专家们认为，在青蒿素抗药性传播到高感染地区之前，遏制或消除抗药性的机会其实十分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保护 ACTs 对于恶性疟疾的有效性，我诚挚希望全球抗疟工作者认真执行 WHO 遏制青蒿素抗药性的全球计划。

中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在结束之前，我想再谈一点中医药。“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大自然

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植物资源，医药学研究者可以从中开发新药。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对于自然资源的药用价值已经有所整理归纳。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

最后，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涵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

衷心感谢在青蒿素发现、研究、和应用中作出贡献的所有国内外同事们、同行们和朋友们！

深深感谢家人的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衷心感谢各位前来参会！

谢谢大家！

来源：人民网

编辑：江南

■ 史苑钩沉

汤一介：北大有三宝

北京大学已经有 110 年的历史，它有许多精神的和物质的宝贵财富。本文只选其中三个北大应重视的“宝贵财富”，谈谈我的一点感想。

北大的燕南园

在 1952 年校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由沙滩搬迁到原燕京大学。原来北京大学的教授多半都住在北京内城。为教学和管理需要，许多教授不得不由内城把家搬到西郊的北大新址。我想是为了照顾这一批教授，校领导或更高层的领导决定，把当时燕园中最好的教授宿舍分配给一些著名的教授，这就是燕南园。我当时有幸也跟随父亲汤用彤先生住进了燕南园 58 号。

我记得燕南园的门牌号大概是由 50 号到 66 号，每栋宿舍或是有单独院子的平房，或是带院子的两层小楼。对这些我不想多谈，我只想介绍一下当时住在这里的一批著名教授。他们许多都可以说是他们所从事的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创建人。当时住在燕南园的有北大

校长、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有经济学家陈岱孙、严仁赓，有物理学家周培元、饶毓泰、褚圣麟，有数学家、我国拓扑学的奠基人江泽涵，有生物学家沈同、化学家黄子卿、地理学家侯仁之、美学大师朱光潜，有诗人、文学史家林庚，汉语语言学大师王力，西洋史专家齐思和，中西交流史专家向达，康德哲学专家郑昕，现代逻辑学家王宪钧，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1956 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定也入住燕南园。历史学家翦伯赞也曾在这个名园住过，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我想，还会有别的曾入住此园的名人，由于我已年过八十，或有遗漏，或有记错，请大家原谅。

为什么我要写燕南园？我认为当时的这个燕南园可以被看成是一座“科学、文化名人园”。上面所列，哪一位不是对中国科学、文化有着突出贡献的名人？哪一位名人不会让我们想起一系列的有血有肉的文化故事？在我国大概

很难找到一块这么小的地方住有那么多科学、文化名人吧！

历史是具体的、生动的，应该有着它传承的生命力，北大的历史也应由一些具体的人与物、事件与联想等等所构成，这些就是北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些寓所的门口钉上一块牌子说：“×××于××××年至××××年在此居住过”。我想，它无疑会使北大的历史生动起来、活起来，它的正面和负面的事件都会激励北大人奋力向前。一块小小的牌子，包含着这些为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献身的人的欢乐、欣慰、愤怒、悲伤和痛苦。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它寄托着的理想、人的感情。没有历史就没有将来。但如今还有人真的重视这些吗？

北大的藏书

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在高校名列第一，在全国名列第三，它是北大的又一“宝”，是我们学校重要的精神财富。在80年代初，我常常去图书馆的“教员阅览室”。我每次去都看到李赋宁先生在那里查阅图书，埋头研究，因为在这个阅览室中有各种外文的百科全书和其他工具书。我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改名为《早期道教史》）就是

在这个阅览室中利用它所藏的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完成的。我整理的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也是大量利用了该馆的图书。我还参与过北大与社科院瓜分佛教藏书的事。我对我们这个图书馆是深有感情的。

但有件事，我常常耿耿于怀。为什么要把胡适的藏书打散？为什么不少北大著名教授的藏书没有被北大收藏？例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的藏书都没给北大，而都被清华收藏。我还听说，王铁崖先生的藏书也归了清华。我不是说，这些藏书收藏在清华不好，也许收藏在清华的条件比北大更好，但问题是北大为什么没有意愿去收藏和利用这些名家藏书？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情况不大了解，但我多少了解一点我们学校文科老教授的藏书情况。就哲学说，我不知洪谦和熊伟教授的藏书现在什么地方？要知道洪谦是维也纳学派中亲自受教于石利克的极少的中国专家，上世纪末他已是维也纳学派中最有权威的年长者。熊伟是现象学大师海德格的学生，在上个世纪末举办的现象学会议常由他做主席，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书集中保管起来，是不是很有意义呢？美学家、书法家邓以蛰先生的书，据我所知有一部分送给了北大哲学系，但还有许多书

现在就不知在何处了。听说，在吴晓铃先生去世后，他的家人曾与北大接触过，希望用吴先生的藏书换两套房子，没有谈成。我们要知道，吴先生所藏中国戏曲和小说的善本、珍本书，还有些孤本不说是全国第一，也可以说是前几位吧！我曾和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联系过，她告我，申府先生藏书约三万册，大多为外文书，但比较杂。我曾向学校报告过此事，并未得到什么反应。还有我父亲用彤先生的藏书，我和我弟弟汤一玄曾写信提出愿无偿捐赠给北大，至今也还没有结果。其他，如朱光潜先生、游国恩先生、周一良先生等等的藏书，我不知是否为北大所重视或收藏。

我认为，把这些著名学者的藏书收藏并利用起来，不仅是了解这些学者的学术成就甚为重要的材料，而且是了解北大文科学术建设和发展历史的重要材料，甚至还可以说是研究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重要材料。在收藏他们的藏书的同时应把他们的手稿、通信、日记、笔记等等都一起收藏。当然，这是需要一定的经费，但是我想，我们买一套理工科重要的仪器设备，有时得花几千万或者上亿元，如果能拨出相当于理工科购买一套仪器设备中的一点点钱，也许文科所有名家藏书（包括手稿）都可以

得到藏书的地方和保护的设备，这难道不是北大应该做的事吗？不也是使我们可以通过这项“名家藏书工程”了解北大的历史，而展望北大的将来吗？

北大的学者

季羨林先生已经住在医院里有三年多了，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对我说：“应该把北大有史以来，在学术上有一定影响的学者的著作择要编辑出版，这是北大的历史，也是我国近现代学术的历史。”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夏曾佑，他说：“夏曾佑也许是不用传统的方法写中国史的第一人”。为此，我曾让一位博士生搜集了一点夏曾佑的材料送给了季先生。季先生为什么一再提到应把现代北大学者的论著择要编辑起来？我想，他是想通过自清末以来的北大学者的著述来了解中国学术的大变迁，并使北大人更加了解北大的学术传统。

由北大哲学系同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首任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梁漱溟先生，继任者是季先生。在北大九十周年校庆时，中国文化书院编写了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为什么我们要编写这本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王瑶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的启发。他说：“现在北大已经在庆祝

自己的九十年校庆了，回顾九十年来的历史，总的看来，它的经历是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充满了如鲁迅所说的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特别是在学术文化领域，如果考察中国现代思潮的变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是不能忽视北大在其中所发生的重要作用的。”因此，他提出应该编一本书，它的名字“可以叫做《从历届北大校长看中国现代思潮》。”于是我们发动十来位年轻学者和博士生在一个月内在把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编写好，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这本书的增订本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们在北大九十年校庆和百年校庆时都推出这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忘记，更不想让北大的年轻学子们忘记北大的学术文化传统。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北大 110 周年时再出新的增订本。原来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中，除编写了历任对中国文化有贡献的校长外，也附了一些

非校长的重要学者，如果能再出版，或可再增加一些在北大任教的重要学者。

我认为，季先生的意见应受到重视。如果我们择要把百多年来在北大任教的著名学者的著述编在一起，各选一本书，其中并附一小传，说明他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的贡献，这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受到“重理轻文”思潮的影响，使得人文学科在大学被边缘化了，因而大大影响了我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如果说在一个阶段，这种情况还情有可原，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原谅了。

在写完“北大有三个宝”后，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在这里学习、工作有六十多年，它是我生长的地方，是我的家，我是无法离开它的，因为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学校。

作者：汤一介

编辑：丁香的花朵

■ 大美北大

燕园 雪中





燕园随手拍 冰雪未名话题

来源：未名 BBS 微博

学员心声

博雅塔下聆教归

2015年11月11日——19日，由省教育厅选派的我县教师李树萍参加了“国培计划（2015）”——专职培训团队研修项目北京大学语文班的学习。

2015年，国培计划改革实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全国各地不同高校承担任务的系列培训，建立起一批国家、省、市、县不同级别的强有力的培训团队，从而促进乡村队伍的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专职培训团队研修项目北京大学语文班安排的学习内容丰富。学员们聆听了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高考语文的命题与阅卷》讲座，北京市教研院语文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李卫东《重新发现语文：语文课程教学改革的几个问题（以阅读教学为例）》讲座，北师大教授，教育部高中语文课表修订组组长王宁教授的《语言学与语文教育》讲座，北京80中语文特级教师、教育部高中语文课表修订组核心成员王岱《一个一线教师的课程探

索》讲座，北京101中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程翔老师《教有学理的语文—侧重阅读教学》讲座，北大语文所所长温儒敏教授《高考改革背景下的语文教学》，交大附中心理教研组长赵楠老师《师生心理健康问题指导策略》讲座，北京教育学院教务处处长余新老师的《教师培训师专业修炼》讲座，北大语文所研究员，教育部高中语文课表修订组核心成员蔡可教授《高中课改背景下的语文课堂教学》讲座。教授们分享了最前沿的语文课程改革动态，让学员们更加明确引领一线语文教师的方向，以及在指导中应注意的问题。来自一线的王岱老师和程翔老师，则用自身的语文实践为例，分享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还分别到了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院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进行观摩、学习。两所学校研训结合，走专业引领之路，在学科建设方面十分成熟，已经构建起了基于本区域中小学教师

现状的研究和引领框架，让来自边远地区县级培训机构的老师们望而兴叹！这是县级培训机构努力的方向，但追赶的路途十分艰巨而遥远。

此次培训，有许多的感动之处：

1、获得精神的指引。专家、教师们严谨治学，稳把语文改革之舵，一心引领语文教学实践的精神让人钦佩，特别是看到讲台上已经耄耋之年的王宁教师、温儒敏教师思路清晰，声音铿锵有力地在谈语文教学的改革，给学员无形的精神动力，不敢懈怠。他们是前方亮着的灯塔。

2、得到方法的指导。此次培训获得的方法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语文学科教学发方法，另一个是实施培训的方法。在互联网+的时代，如何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科学有效地实施好本区域的培训，是一个挑战。在互联网+的背景之下远程培训成为主流，而工作坊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方式。在此次培训中，北大为我们安排了四个半天，专门解决基于网络研修之下的工作坊项目设计问题，让培训团队的老师们通过实践，对实施方案设计有了实操经历，更全面地去理解培训。

3、促进自我反思。

每一次外出培训，我都会思考本次培训和本校培训之间的差距。北大作为名牌高等学府，有着我们无法企及的资源优势和文化氛围，让我高山仰止！每一个进入北大的人，都会无形之中得到浸润，受到感动。反思本地的培训，觉得几个方面值得反思：停留在理念、方向上的多，而结合实际、具体的似乎还少了些。特别是在学科上，如果能够划分模块，各专题之间形成互补，更会受到欢迎；从聘请的专家看，也须进行监管，需要他们确实有干货，而且在本次培训中展示；培训期间的学员组合及舆情监管也是重要的。学习优秀的地方，完善细节，努力改变。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很多。

4、增进同行的情谊。

这次培训虽然只有八天的时间，但老师们积极地相互了解、交流，相互分享工作中的得失，建立起一种联系。特别是QQ群的建立，为大家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不时可以看到老师们心灵碰撞的火花闪现。相信学员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后，还会在在群里继续交流、学习。

5、感受到了北大美丽的秋景。

将离开了，脑中忘不了的还有这秋景。刚走进北大，便出现满树绚烂的金黄杏叶，那样地吸引着大家的眼，还有心！每天，都会刻意起得早些，好留出时间到杏树下走走、拍照，捡拾几片杏叶，换一份好心情，然后用最好的状态走进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期间，感受到了北方气温骤降中树木的瞬息万变，这对来自南方的老师来说，是个视觉的冲击，也是一份新奇的感受。

6、晨读，让我们重温读书的美好。

这次学习，北大特意为学员们准备了《未名湖畔好读书》，并安排了晨读，这勾起学员对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也体验着读书的乐趣。清晨，

朗朗书声，加上带读的老师的神情并茂，这培训就多了别样的滋味，心特别感到润泽。

“博雅塔下宜聆教，未名湖畔好读书。”历时八天的培训，聆听教授们对高考改革背景下语文教学新理念、新方法的指引，增添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引发新的思考，助推着对培训模式的新的改革探索。

来源：景东教师进修学校

作者：李树萍